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六期 (交流文稿) 2011年5月10日

目 录

【一手按“Ctrl”键 + 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狱中之狱(牛立华)	2
抗战时期南开生活琐忆(齐邦媛)	13
被打成右派的抗战英雄工程师李温平传奇(丁 抒)	28
崔永元谈抢救口述史——柴静博客中的转述	32
右派情缘(李文书)	33
老温一小温一老温(老 赵)	40
迟到半个世纪的忏悔(罗洪生)	44
大跃进年代大学校园里的吃饭轶事(陶渭熊)	46
唉！窝囊也能死人(老 赵)	49

【关于《巴山夜雨》】友情交流的电子通讯，不定期，不定篇幅。无稿酬，也不收“版面费”。欢迎来这里“聊天”，把你们的往事琐忆、旧闻杂记、亲友追思、人生感悟等等写给我们，也可提供那些字行间回荡着历史风云的故纸残篇，如曾被视为“毒草”的昨日言论，曾被藏进箱底的日记书信，以及影响了个人和家庭命运的一纸判决书、平反改正通知书等等。赐稿请发至电子邮箱：bsyy1957@126.com

向捐款资助本刊下载复印纸本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狱中之狱

牛立华

莫名其妙关进小监

1968年8月11日，星期日，照例吃两顿饭。下午4点，各监舍的犯人由当班的值星员清点人数，排队，然后向岗楼上的持枪管理员报告，请求准予出去打饭。

按照监狱的规定，做任何事情之前，必须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值星员先小声向身后集合的犯人说“对于反动派”算是提示大家背哪一段，然后喊“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排着队的犯人跟着用鼻子和嘴发出一种混合的声音；“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背诵完毕，值星员再次立正，面向岗楼上的管理员报告，几工区多少犯人出去打饭。报告完了用不着等回答（一天从早到晚，无数人报告无数次，管理员懒得回答——虽然是有点儿不礼貌），可以直接列队走出围墙大门，到厨房的窗口每人领取一个拳头大小的玉米馍，一瓢莲花白（学名结球甘蓝，俗称洋白菜，圆白菜）老叶子煮的菜。

等到这个小队的四十几个犯人都拿到了玉米馍以后，一齐端着碗走到围墙外面那个岗楼底下，再次列队背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犯人值星员立正，向武装管理员报告刚才出去了多少人，现在进来了多少人。懂事的值星员都是老犯人，专选字数少的语录，免得耽误大家吃饭，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一群犯人嘴里背的是毛主席语录，眼睛里看的心里想的却是那个黄澄澄的玉米馍和那碗乌绿色的菜。

岗楼上的管理员一般不管犯人含含糊糊念叨的是什么东西，只要是犯人站好了队，人数不差，就算完成了规定的仪式。只要刚才出来的人数和现在要进去的人数一样多，管他们嘴里嘟囔什么，一律放行。睁大眼睛监视着刚才出来的这群犯人一个一个回到高墙电网之内是他们的主要责任。

吃过饭以后，犯人都回到了监舍之内。那天，空中灰蒙蒙的，看不见蓝天，也看不见白云，一片晦暗，特别的闷热。

我穿着一件短袖汗衫，一条短裤，站在监舍门口往外看。几个内勤组的犯人从外面抬了三张条桌，端了七八把木椅子进来。平时干部给犯人训话，和每天晚上的集合点名都是站在那个堡坎上面，有时候一训话就是半个小时，也没见端桌子、椅子，今天有什么隆重的事呢？

跟着，指导员周金仁进来了，还有小队长唐炳南、徐绍华、田加伦，场部来的外号叫“小爬虫”的那个比指导员还大一级的教导员，记不得他姓什么了，大约是高中文化，在劳改队里就算是有文化的狱卒了。和另外三四个不熟悉的人，阵容十分强大。

一声令下，犯人全体集合，列队站在那个坑坑包包的院坝子里，各小队分别报告，一工区（小队）报告：“应到四十六人，实到四十六人，报告完毕。”二工区报告：“应到四十七人，实到四十七人，报告完毕。”三工区报告：“应到四十二人，实到四十二人，报告完毕。”……

一会儿的时间，苗溪茶场劳动改造管教支队第十三中队所有关押在高墙电网之内的犯人集合完毕。将近三百人，密密麻麻站到这个狭长的土坝子里。三个岗楼上的哨兵都把身上背着枪拿下来，改成了似乎临战的持枪姿势。

周金仁主持今天的大会，开宗名义第一句话：“牛立华，站出来！”

原来是喊我，是祸躲不脱，劳改队里司空见惯了，我闻声即起，站到了前面的土台子上，面对着下面站着的一大片犯人。

周金仁凶神恶煞地叫喊着：“牛立华思想反动，现在宣布关小监。”

紧跟着却没有任何检举揭发，也没有指出我有什么违法行为，有什么犯罪事实，也没有说我违犯了哪条监规。那个歪眉斜眼的二工区小队长唐炳南拿出一副特制的手铐，把我的两只手扭到背后，紧紧地铐了起来。

不知道后面坐着的哪个公安干警喊：“低下头来！”

我往左边看了一眼又往右边看了一眼，思索了一下，略微抬了一抬本来就昂着的头。

这时候，下面的犯人队伍中有人吼“脑壳啄起”（四川方言，啄的发音是 zhua，啄起即低头）。我扭身回头，扫了一眼坐在后面的几个人，大声说：“我不能向犯人低头！”心里在想，你们披着人民公安干警的外衣干着摧残人民的事，才是对人民有罪的犯人，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只向毛主席低头！”

当时之所以喊出了这句话，大致出于如下几点原因：

一、个性使然，“士可杀，不可辱”。

二、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做过不利于国家的事，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却被当作了反革命，被无端地批斗，心里有一股怨愤。

三、我对劳改队里动不动就以手铐、脚镣相威胁，十分反感。

四、周金仁和唐炳南、徐绍华这三个狱卒心狠手辣，以折磨犯人为能事，我要让他们知道人是有血性的，不是可以任意宰割的，暴力是不能使人折服的。

五、手铐脚镣，捆绑吊打是劳改队的家常便饭，多数犯人被抓出来批斗的时候，迫于淫威都低着头，个别不肯低头的，被狱卒按一下脖子，虽然心里愤愤不平，表面上还是低下了头，还真没听说过谁敢在批斗会上公开扬言不低头，我就要冒着挨打的危险，发一发反抗的心声。

六、那时我还相信毛泽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相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在纸上的东西是当真要执行的，不是做做样子糊弄老百姓的。认为下面的做法违背了中央的政策，我要以身试法，大力呼吁纠正这个歪风。

我的话音刚刚落地，旁边的一个公安干警（没看清楚是谁）横脚一端，我没有提防，又被反铐着两手，失去平衡，一下子跌倒在地。紧接着就是一顿乱脚猛踢。

这时候从底下跑上来两个“劳改积极分子”，一个叫王经文，一个叫彭世同。王经文，中学文化，地主家庭，是 1950 年四川省天全县反共组织的后勤部长，该组织后来被共产党歼灭，主要头目均被镇压，王当时只有十八岁，从轻发落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彭世同，初中文化，是 1960 年肚子饿得受不了因而不满共产党统治自发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之一，破案后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他们两个一左一右站在我的两侧，一只手按我的脖子，另一只手反提着手铐往上拉，成了背后戴着手铐的喷气式，对我横加折磨。

周金仁在上面讲话，内容却与我无关，无非是说不接受改造就没有好下场之类的话，恐吓而已。

接着宣布散会，把我关在了小监里面。这时候大约下午 5 点多钟。

小监的生存环境

当晚，因手铐卡得很紧，陷在肉里，刺痛之痛，令人难忍。至今我的两个手腕上还遗留着当年手铐造成的疤痕。

小监里面没有灯，已经是漆黑一片了，我默默地想着，解放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基本上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带着红领巾长大的，而且对共产党从感恩到信仰、崇拜都是出自内心的。

参加工作以后在军工企业任技术员，工作上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优秀共青团员，出席重庆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即使 1957 年被无端地打成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也还没有对共产党完全失去信心，仍然努力地工作着，幻想着祖国和个人美好的未来。

作为一个科学技术人员，从来没有过政治野心，只想以自己所学为祖国服务，有一点成名成家的思想，在劳动教养那种十分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偷偷自学外语，可以阅读俄、日、英文有关专业技术资料。还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和译述，想着有一天能够自成一家著书立说。这些个人的意愿和祖国的繁荣富强没有任何矛盾，从来没有侵害过执政党的利益，怎么会成了“反革命”而且是极

端危险的反革命呢？难道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竟然那么害怕人民、那么脆弱，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会让他们胆战心惊到如此地步，未免也太可笑了吧？想着想着又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犯人炊事员送饭来了，他开开门看了我一眼。我的两手被铐在身后，无法拿碗，这个炊事员姓甚名谁我不知道，大约五十岁，一头白发，外号叫白毛，心眼比较好，给了一个瓦钵，把玉米馍馍和菜倒在瓦钵里，一句话没说，把门关上，挑着担子走了。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我巡视了一下小监的概貌。这是一间长宽大约 1.75 米的房子，空间的高度有 2.2 米。三面是抹着白灰的整体砖墙，前面也是砖墙，只是左边有个厚重的实木门。右边离地面 1.5 米左右开了一个长宽大约 0.7 米的窗子，窗子上自然少不了一根一根牢固的钢条，铁窗外面不是玻璃而是木板，木板下方留了一个 0.2 米见方的洞，可以起一点通风透光的作用。房子里没有一根电线，没有灯，只能靠铁窗下面的洞和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隙透一点光线进来。靠窗子一方紧挨着墙壁安了一个固定的木板铺，宽 0.8 米，离地 0.3 米左右，上面铺着稻草。靠门的一角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木桶，算是室内厕所。从此吃喝拉撒睡就都在这三平方米的斗室之内。

早饭送来了，怎么吃呢？没有筷子，没有勺儿，更没有刀叉。就是有也无法使用，因为我的两只手反铐在背后，拿着筷子也够不着自己的嘴。所以只能像猪狗一样低着头用嘴去拱、去啃。多年来一直在宣传“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现在可是新社会，却把人当作猪狗了。

1968 年内，关我的这间房子先后关过两个人，头一个不久就一命呜呼了，据说死亡原因是“自我摧残身体”。第二个也命在旦夕，四天前大部分犯人出工了，管教干部把他喊出去却不见他回来，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许是送医院了，也许是上了天堂，总以后不见下落，也没有人敢问。

这天中午，炊事员又来送午饭，随着来了一个干事（劳改队里的公安干部除了队长、指导员，都叫干事），炊事员打开门，这位干事忙着往旁边躲，他不敢正对着门，因为一股热风混合着臭气随着打开的门喷涌而出，熏得他不由自主地要往门后面躲。由于他站在门后边，只能侧身斜着眼睛往里看，我则正对着门口怒目而视。他在亮处，我在暗处，我看他看得特别清楚，他显露着一副高度警惕的样子，好像我能够把他吃了似的。

我转身拿那个瓦钵（早晨用过的，没有水，所以没有洗），准备交给炊事员盛菜和玉米馍馍。这位干事壮着胆子喊了一声“出来”。

小监面对高墙，中间是 1.5 米宽的过道，我迈出小监的门，站在过道里，太阳有点晃眼睛，我一句话没说，看他要做什么。

他走到我身后，拿出钥匙把手铐上的锁打开了。由于昨天下午手铐戴得非常紧，铁铐陷在肉里，已经和手腕连在一起了，他这一开，撕裂人心的痛，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锁打开了，放松了一扣，又重新锁上了。我又回到小监里，身后的门重重地关上了。

如果不放松，肿胀的手有溃烂的可能，那就残废了，不能给劳改队干活儿了。监狱干部常说他们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大概放松一扣手铐就是人道主义的体现吧。

我戴着背铐把那个瓦钵放在木板铺沿上，蹲着身子像猪狗一样一口一口地吃完了玉米馍馍和菜。然后斜靠着墙坐在木板铺上。

监舍里的犯人都出工去了，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高墙外面不时传来阵阵蝉鸣，像是告诉人们世界上还有生命。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从远到近的脚步声，走到我住的这个小监门前停住了，却没有开门，我警惕地听着：干什么来了？

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之后，奉命而来的这个人用木板把铁窗下面的那个通风口封死了，屋子里顿时暗了许多。

在十三中队，这样的小监一共有十间，都集中在一栋平房里，这栋平房邻近围墙的头一间房是宽三米、进深四米的医务室，有一个刑满释放被强制留在劳改队就业、半途出家的卫生员充当这三四百犯

人的“保健医生”。挨着医务室就是特殊设计的小监，前面五间面对院子，犯人收工以后需要看病的要走过这五个小监的门口才能到医务室。后面的五间面对着的是高墙和电网，除了给小监送饭的炊事员和倒马桶的犯人以外，一般犯人是允许到后面走动的。

我被关在后面，本来就已经十分僻静，现在把通风口也给堵死了。我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从近到远，没听见在其它房间钉木板、封窗口的声音，也就是说劳改队的几个头头给我特殊待遇。日夜带着背铐，关在小监里，还不放心。似乎留一个通风口就还能发号施令摧毁这个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似的。我能得到这样的另眼看待应该自豪了。

小监是狱中之狱，如果不是亲临其境，很难想像。

五十年代我看过一部电影《上饶集中营》，里面有监狱中的生活状况，六十年代看过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其中也有监狱环境的描写，都是共产党写国民党的监狱。看过这电影、小说的人不在少数，现在我如实地记述一下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的小监生活，有兴趣的人们不妨回忆对比一下，看看谁更法西斯。

名曰小监，空间自然不大，我身高 1.73 米，躺在铺板上，头和脚可以同时接触到两端的墙。

空间狭小，房门日夜上锁。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从来不放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监狱都要安排放风的时间，有的一天一次，有的一天两次，著名的法西斯监狱和“极端残忍”的渣滓洞、白公馆、息烽都要放风。中共的监狱独具特色，据说著名的秦城监狱也是不放风的，号称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中共可谓开创了一代新政。

水是生命之源。正常的人每天都要喝水，每天都要用水。小监是没有水的，关在里面的人不可能洗脸、刷牙，不是一天两天，天天如此。至于洗澡更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四川有句俗语“磨皮擦痒”，牛在树干上来回蹭，猪在圈里反复磨擦砖墙，都是这个行为。我在小监里身上痒得厉害了就在墙上磨擦，每天都要做无数次这样的动作。

衣服是要勤洗勤换的，进了小监可从来不换衣服，我在小监关了九个月，进去的时候是 8 月份，穿着汗衫和短裤，雅安号称雨城，“巴山夜雨涨秋池”，夏秋之际晚间多夜雨，白天出太阳，湿度大，气温高，屋子里湿热难当，一身酸臭，衣服粘在身上，两只手被固定在背后，只有靠全身扭动、抖动，让粘在身上的衣服换换位置。暑往寒来，12 月份雅安地区的气温降到了零度左右，我还是穿着 8 月份那套汗衫和短裤，冷得浑身发抖。经多次要求，临近元旦才允许我到原来关押的监舍里拿了棉衣、长裤。

活人要吃饭也要排泄，这三平方米左右的狭小空间，既是卧室，又是饭厅，还是厕所。木制马桶上没有盖子，十天八天才有人来倒一次马桶，马桶保持原汁原味，从来不冲洗，夏秋之际，粪便生蛆，腐臭熏天，秋冬虽冷，恶臭依然。好在“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小便好办，大便要脱裤子，很简单的动作对于被反铐着的人来说也成了难事。拉屎以后擦屁股本是举手之劳，在小监里可办不到。一是没有卫生纸，关进小监四个月以后，我被获准拿了一套《毛泽东选集》进来，是小监内唯一的纸制品，我对他老人家的著作敬重如圣贤，一字千金，舍不得擦屁股用，那纸也比较光滑硬脆，估计用来擦屁股既擦不干净也不舒服。再说那可是亵渎红太阳的罪名，杀无赦。二是戴着背铐的两只手够不着自己的屁股，想擦也没法儿，免了吧，既节约又省事。关了九个月过了两百多天拉屎不擦屁股的生活。

犯人是不能蓄发的，一般每个月由专职理发员推光一次。关在小监里省略了这道工序，由着头发自由生长，不洗头不理发头皮很痒，因为戴着背铐，没有办法挠，只有在门框上来回蹭脑袋，蹭完了前面蹭后面，日久天长，门框下面积累了一层很厚的头皮屑，这小小的玩意儿还会发霉，长出了灰白色的毛，不细看像是法兰绒毯。

小监内苍蝇蚊子飞扬跋扈，故意欺负我，两手被铐在身后无法动作，只能任它嚣张。苍蝇的个头挺大，翅膀震动起来特别有力，嗡嗡的声音驱除了小监里的寂静。我眼睁睁看着它们自由自在地飞翔，

随着它们在空中遨游的踪迹做颈部运动，也算是一种锻炼，直到现在七十多岁没有犯过颈椎病。

白天是苍蝇的天下，晚上蚊子当仁不让，轮流坐庄。蚊子比苍蝇残忍，它要叮人吸血。怎么才能制服叮人的蚊子呢？冥思苦想，无计可施，灵机一动，有办法了，叮咬前面，可以用嘴去吹，把它赶走，要是叮在背后，只能用背撞墙。

小监里没有灯，天气好的时候，上午9点到下午4点左右，窗户缝透进来的光线提供了自然的照明，可以看书写字，其余时间我则闭目养神与黑暗相伴。为了记住日子，我每天用手指甲在墙上划一条痕迹，应该有二百七十条左右，如果那个房子还没拆的话，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寻找一下旧日的踪迹。

在小监里关久了，已经适应了戴着背铐吃饭，没有水却是个大问题。幸好劳改队的饭菜缺油少盐，不至于过分口渴，但是免不了还要喝水。开始的时候我试着对送饭的炊事员说：给点水吧。那个外号叫白毛的炊事员没有回答，但是第二天早晨8点送饭以后，将近10点钟的时候加送一次开水，用一个容量一升锈迹斑斑没有盖子的搪瓷杯装着，放在墙根附近，足够一天喝的了。我始终记着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难友。由此每天有了一升左右的水可以自由支配，我感谢这位犯人炊事员，是不是还需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呢？

但是好景不长，送饭的炊事员换了，后来这个叫徐国权，四川邛崃或大邑县一带的农民，不知道因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他来给小监送饭不送水了，我两三次求他送一点水。一天中午外面有脚步声，我知道送饭的来了，起身等着开门，可是他不像往常一样按着房间的顺序送饭，而是把我这间房跳过去了，送完了所有房间以后才走到我的门前，一会儿门开了，丢了一个玉米馍馍在我的瓦钵里，随手舀了一瓢菜汤，我说：菜呢？他气冲冲地回答：你不是要水吗！哐当一声，把门关上了。我心里默默地念道，人啊，人！古人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些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已经被异端邪说冲击得所剩无几了。同样在监狱里，都被打成反革命，竟然还要互相残杀，这种人性的扭曲是谁造成的呢？无疑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恐怖统治。

北方有句俗话，好吃不过饺子，舒坦不过躺着。睡觉是一种享受。带着背铐睡觉却是一种折磨。仰卧肯定是不行的，岂料俯卧也不行，背在后面的两只手很快就会痛得难受。只能够勉强侧卧，一夜之间翻来覆去辗转难眠。长期地一天二十四小时戴着背铐，才能感知这“人道主义”是什么东西。

面临的抉择

监狱里的小监是为了折磨人至死而设定的，然而人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人的适应能力也是很强的。但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

我该怎么办呢？

一是低头认罪，可是我找不到自己犯了什么罪，既没有参加任何“反动”组织，也没有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反革命行为，没有书写或张贴过反动标语、传单，没有呼喊过反动口号，没有收听敌台和里通外国。我多次向公安、司法部门的官员表示，只要能够举出具体的事实，是罪我就认，是错我就改。可没有人能够给我举出哪怕是一点点。没有犯罪事实，怎么认罪呢？回想1957年，起初我还据理力争，后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之下，在“胳膊拧不过大腿”、“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之下，低头认罪，写了检讨。于是授人以柄，自己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划为右派自然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了。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一次我就要认真一下，没有罪就不认罪。

二是以死抗争，监狱里死人的事是常有的，有病死的，有死因不明的，也有自杀的。拉出去，挖个坑一埋了事，殊途同归。

我不想死更不能死，我要活，我要做人。如果现在以死抗争，只能博得部分人的同情。人死了，许多事实无法澄清，许多黑暗无人揭露，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罪过，所以我不能死。

坚持活下去的想法出于我对未来的信心，1957年初，我基于对中共虔诚的信念，交过入党申请书，认真地学习《党章》，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我这时以同样虔诚的信念，期待着毛泽东所说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因为我的确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我要活着看这个世道怎么变化。

每天早晨起来以后，尽管小监里没有水，不能洗脸刷牙，我总是用反铐在背后的手慢慢地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以此表示我热爱生活、不会颓废的心境。

临近节日，比如五一、国庆、元旦、春节等，监狱都要进行大检查，所有的在押犯人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拿到院子里，无非是一块垫褥，一床被子，几件衣服和吃饭用的碗、盆、锅。三百多人的行李摊在坑坑包包的泥土院子里，像是摆地摊儿。各工区的狱警一件一件地看，重点是文字材料，但凡发现写着字的纸或小本子一律没收，带回去“研究研究”。众犯人不敢怒也不敢言。

我在小监里关了一个多月没有提审，除了每天送饭的炊事员和十天半月来一次倒马桶的犯人以外，无人问津。倒想乘大检查之机出去透透空气。

9月30日监狱大检查，我在小监里听见外面人声嘈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知道有人来视察小监，一会儿，门开了，狱警指导员周金仁站在外面，我戴着背铐斜依在铺上看了他一眼，随即收回目光，一语不发。他问：“你想好了没有？”我回答说：“想什么？”他说：“要认罪，给我写检查材料。”说着喊我出来，用钥匙打开了手铐。我没有纸，没有笔，跟他说了，他让一个犯人送来了一只蘸水钢笔，十来张拟稿纸，一瓶蓝墨水，关上门走了。

手铐打开了，两只手可以活动了，可我该怎么写呢？认罪吧？自己都找不到犯罪事实；不认罪吧？小监里的非人生活、继之而来的种种折磨的确难以长期忍受。我本着“调子尽量放低，原则不容放弃”的思路，写了下面一份材料：

一、概况

我于1966年7月12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逮捕，同年9月被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如此长刑，必有重罪。但我既未参加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反革命行为，没有任何反动笔记、文件，没有书写和张贴反动标语、传单，没有呼喊反动口号，没有收听敌台广播或里通外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任何违法活动或抗拒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一直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从来没反对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尽管原单位的某些人采用种种手段制造材料，又通过“审理”人员千方百计的拼凑罪名，必欲将我置之于死地，他们煞费苦心也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犯罪事实，为了达到判刑的目的，于是便加给我这样一条唯一的罪状，即“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反革命言论”，匆匆判处，投入劳改。

二、罪状能否成立？

如前所述，按照判决书，我唯一的犯罪活动就是“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反革命言论”。我认为这条罪状成立至少需要三个条件，（1）讲的是反革命言论，（2）确系有意散布，（3）符合政策规定，三者缺一都不足以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现就此分述于后：

（1）讲的是不是反革命言论？

判断言论是否反动应以毛主席著作为最高的衡量标准。凡是反对毛主席、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才能叫反动言论。纵观我自社教以来，甚至可追溯到解放以来的一切言论，从来没有反对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恰恰相反，我反对的是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不执行党中央既定政策的行为；反对的是阻碍社会进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虽然起诉书的作者采用了或斩头去尾、或拦腰截断、或歪曲原意、或无中生有的手法，把他们认为最“恶毒”最带“攻击性”的“反革命言论”拼凑在一起编造了一纸罪状，明眼人却不难看出其中的破绽。例如被赫然列为第一条的反革命言论是，“三面红旗下面执行过左”，我承认这种看法有些问题，但仅仅认为下面执行过左，决不能断定就是对三面红旗的

恶意攻击。对起诉书中所列的其他言论，只要依照客观事实略加分析，便可察觉我怀疑的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反对的是盲目的、形式主义的、对革命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信仰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的科学的革命理论，拥护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审理期间，我再三提出可以动员全厂的人进行检举，把我的一切言论收集起来，全面地而不是断章取义地，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依照客观事实逐一地进行分析，指出哪些是反动言论，反动性在什么地方，只要这样做，我就完全认罪。但原审法院并没有这样做，既未切实调查，也未认真审讯，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就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扣一个反动的帽子，并据以判处十五年徒刑，这怎能让人接受呢？

（2）是否为有意散布？

在一个时期内，我的确产生过错误思想（没有构成言论），也说过一些错话（构成了言论），主要表现在对劳动教养政策和实践严重脱离不甚理解，对“三面红旗”的成果持怀疑态度。

劳动教养不经过法律程序，无需审讯，不核对事实，不容许答辩。只要该人所在单位写一份材料，不经当事人过目和认可，上报所谓劳动教养五人小组，即被强制劳教，这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吗？

劳动教养按照公开颁布的政策是最高行政处分，即没有剥夺当事人的公民权。然而劳教单位的管理却与监狱相似，不准离开劳动场所，不准迈出劳教单位大门一步，来往信件均需经过管教人员的严格检查，甚至家属寄来的包裹不通知本人即被退回，从精神到肉体，从形式到内容都被列为专政对象，难道人民向人民实行专政？

颁布劳动教养条例时，《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其中说：“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劳动教养之前在原单位任技术员，月工资 69 元，在劳动教养场所同样从事技术工作，技术难度和工作量有增无减，每月却只发 15 元生活费，1961 年摘掉帽子以后也只有 19 元，直到 1964 年才提高到 39 元。这能叫做“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么？

按照明文规定的政策，对于刑满释放的人员只有在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本人自愿申请的条件下，才允许留在劳改单位就业。对于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更不能够强制性地留在劳教场所。但是实际上，除了 1962 年释放了个别老弱病残以外，绝大多数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以后均被强制留在劳教场所，工资和劳教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只要进了劳教或劳改场所，一辈子也回不到人民行列里来。周恩来在 1957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说：对大多数右派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还是敞开着。为什么公开发布的政策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3）是否符合政策规定？

且不谈强加给我的罪状不符合客观存在的事实，退一万步来说，即使真的谈了反动言论，是否就必须立即处以十五年有期徒刑呢？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以中共中央名义颁发的政策指导性文件《十六条》明文规定：“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红旗》和《人民日报》1967 年元旦社论也曾指出：“对于思想反动但无违法行为的右派分子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方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指示得更为明确：“凡是利用大民主或其它手段散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组织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按照上述既定政策，如果只是单纯地谈了反动言论，一般是不会处以重刑的，何况我还没有散布反动言论呢。

综合上述三点，可以有证据地说：判决既未依据事实又不符合政策规定。

对于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强加给我的各条罪状，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逐条具体辩答。如果原告和原审法院至今仍确认判决是合理的，则请驳倒我的答辩，用真凭实据揭露我的罪恶，用充分理由说明判决依据。只要证据确凿、理由充足、符合政策，我是完全认罪的。……

10月4日，心狠手辣的周金仁又来视察，打开门以后他站在过道里厉声问：“写好了没有？”

我说：“还没有。”

他以呵斥的口吻说：“三天还没写完，写的什么？拿来我看看。”

我说：“等写完了再拿给你看吧。”

他凶神恶煞地嚷着：“拿来我看！”

我只好把还没有写完的东西拿给他，只有三页。他看了不到两分钟，恶狠狠地说：“出来！”跟着又给我戴上了背铐。

接着近乎歇斯底里吼叫：“不认罪，关死你！”随后用脚踹我的小腿，我站立不稳跌倒在地，两只手被拷在身后，艰难地蠕动着身体爬进了小监。

戴着背铐写自述

狱卒周金仁那句话“不认罪，关死你”不是说着玩儿的。

监狱里死人是常事，精神上的摧残、肉体上的折磨、常年处于饥饿状态、繁重的体力劳动、捆绑吊打的威胁、恶劣的生存环境、简陋到几近于无的医疗条件都是死亡率高的原因。在周金仁、徐绍华、唐炳南等狱卒眼里，死一个人不如死一头猪，平时对犯人极尽摧残折磨之能事，唐炳南的口头语之一是“死十个，数五双，当个毬疼。”被关在小监里的犯人属于“反改造”之列，更可以任意残害，以表示他们效忠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

除了死以外，精神失常更可怕。我所在的三工区四十二个犯人有十二位是精神病，那些监狱的干部骂他们是“装疯”，对这些难友无所顾忌地横加折磨，惨不忍睹。

我当时的想法是：

一、不能死，我要活着看这个世界怎么变化。

二、保持镇定的情绪，不能精神失常。

周金仁既然说了“关死你”，我就要做好思想准备，必须有坚定的求生信念，他越想让我死，我越不能死。

我坚信中国的政局必然会有变化。

有了坚持活下去的信念，还需要保持健康的心态。

坐监本来就是痛苦的，终日戴着背铐关小监更是非人的折磨。在多重压力下，被关小监的人精神失常的概率很大。怎么避免呢？除了乐观、坚定以外，需要找点事做，或者找点书读。小监里无事可做，那就找书读吧。文革期间的监狱除了毛泽东著作以外不准保留任何其它书籍，经过多次请求，允许我拿了一套四卷本毛泽东选集、钢笔和部分纸张，从1969年元旦开始在小监里真正闭门读书了。

小监里没有电自然也没有灯，幸好铁窗外面钉着的木板不那么严丝合缝，木板之间的缝隙能够透进来一点光亮。遇上晴天，早上9点左右，就可以借着这点光亮看书、写字了，下午4、5点钟已难于分辨字迹，每天大约有七八个小时的白天，十六七个小时的黑夜。

白天，我用铐在背后的手把被子叠成一个方桌形状，把书摊开放在这个软“桌子”上，一篇一篇地找到需要阅读的页面，用两本书压住，然后侧着身子逐字阅读。读完了这一页，又要把身子转过来，用戴着背铐的手翻到下一页，继续阅读。就这样在小监里把《毛泽东选集》通读了几遍。

通读了几遍《毛泽东选集》，我依然关在小监里，除了每天送饭的炊事员和十天左右来一次倒马桶的犯人以外，见不到其他人。

无人过问也无人提审，一天一天地过着夜长昼短的日子，没有人说一句话。在黑暗里静静地坐着的时候，耳畔似乎回响着“关死你”“关死你”“关死你”那恶狠狠的吼声。

虽然我想活，艰难地支撑着日益羸弱的躯体，死神却随时可能降临。恶劣的生存环境让我不得不考虑万一死了怎么办，我需要写一份自述，简略地记录我的历史，便于死后让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了解我是无辜的，我是无罪的。

有了纸和笔，对于正常人来说就可以写文章了，两只手被特制的铁铐铐在背后的人能够写字吗？我艰难地摸索，先把一本《毛泽东选集》放在棉被叠成的“桌子”上，再放一张纸，然后脱掉披着的棉衣，把紧紧铐在一起的两只手移到腰部右侧，歪着脖子扭着身子让目光看得见铺着的纸和握着的笔，这种写字的姿势很难受，脖子酸，手腕痛，但是为了写自述只好忍受，我庆幸终于戴着背铐也可以写字了。

自述篇幅不宜过长，但是篇幅过短又说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怎么压缩也需要三、五万字。一张16开的拟稿纸通常容纳500字，写40000字就需要80页，既难以藏匿又不便邮寄，劳改队随时都可能检查，如果刚写出来就被查获，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我必须缩小字迹，压缩篇幅。经过试验，可以在一张16开的横格纸上写5000到6000字，字迹小到不用放大镜仍可看得清楚。

从1969年3月开始在小监里戴着背铐写自述。先打腹稿，总的体例是给党中央的一封信，除了前言和结语以外内容包括十二个部分：

- 一、概况；
- 二、罪状能否成立？
- 三、为什么要将我判罪？
- 四、有关五七年的一些问题；
- 五、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
- 六、审讯过程；
- 七、对起诉书及判决书的回答；
- 八、投入劳改以后的简况和被关入小监的原因；
- 九、关入小监后的想法和做法；
- 十、几点请求；
- 十一、我的愿望；
- 十二、我对毛主席的态度。

全文约四万余字，压缩在八页16开的横格纸上，平均每页五千余字，在小监那个恶劣的环境里每天只能写一页，八天写完一份，为了不至于被查获，一共写了三份，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写完以后，我如释重负，一份藏在睡铺下面的稻草里，一份藏在脚上穿着的鞋帮里，一份藏在棉衣里，等待着传递出去的时机。

尽管1957年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有一些怀疑，文革中对司法机关的黑暗有一些了解，仍然没有对毛泽东失去信仰，甚至在被捕入狱、被打成反革命、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以后依然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存有幻想。青少年时期接受的共产主义可谓根深蒂固，所以在小监里写的这份材料仍然是忠实于共产主义理想、拥护毛泽东的笔调。

活着出来了

1969年5月下旬某日中午，送饭的炊事员打开了小监的房门，仲夏的阳光照射到室内，眼前为之一亮。我戴着背铐领取那个玉米面馍馍和菜汤，按照常规，炊事员发完了饭菜立即关门上锁，这天却不见动静。我好奇地抬眼一看，门外站着一个人，高大魁梧，仪表堂堂，四方脸型，肌肤略显松弛，透露着养尊处优的神态，大约五十多岁，他正在不动声色地上上下下打量我。

他看了我一两分钟，开口问道：“你犯的什么罪？”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他又问：“那你怎么进了监狱？”

我半闭着眼睛说：“不是我想进来的，是被抓进来的，据说是反革命。”

“你被捕以前是干什么的？”看来他想刨根问底。

我说：“兵工厂的技术人员。”

他又看了我几眼，没说什么，随着退后一步，这时候炊事员从旁边过来关门上锁，我则把盛着玉米面馍馍和菜汤的瓦钵放在地铺的边上，弯着腰低着头像猪狗一样啃起了中国特色劳改犯的午间套餐。

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昨天来过的这位监狱干部带着理发员来到小监，开了门以后，让我站出来，跟着理发员给我剪掉已经蓄了好几个月的长发，理发员走了，他引着我来到一棵大树的阴影底下，他坐在藤椅上，给我安置了一个小凳，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只好任其摆布，坐在小凳上等待下回分解。

他先发话：“你叫牛立华？”

看来昨天他见过我以后查阅了我的档案，或许还向其他狱警探询过有关我的情况，今天是有备而来。我“嗯”了一声，给以肯定的回答。

他接着说：“你谈谈怎么被判刑的。”

我于是把那一段让我念念不忘因而烂熟于胸的话在他面前背诵了一遍：“我于1966年7月12日由成都市公安局逮捕，同年9月被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十五年。如此长刑，必有重罪。但我既没有参加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反革命行为，没有任何反动笔记、文件，没有书写和张贴反动标语、传单，没有呼喊反动口号，没有收听敌台广播或里通外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任何违法活动或抗拒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一直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从来没反对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尽管原单位的某些人采用种种手段制造材料，又通过审理人员千方百计地拼凑罪名，必欲将我置之于死地，他们煞费苦心也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犯罪事实，为了达到判刑的目的，于是便加给我这样一条唯一的罪状，即‘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反革命言论’，匆匆判处，投入劳改。”

我说了大约两分钟，一边说一边看着他的表情。他低垂着眼帘，目光侧视却全神贯注地听着。待我说完他紧接着问了一句：“你暴露的什么思想？”

我回答说：“这要从1957年说起。”

他在藤椅上动了动身子，看了我一眼，抬起右手示意我继续说。

我说：“好的。我从小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带着红领巾长大的，曾经天真地发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后又参加了共青团，热爱党，热爱祖国。1957年曾经交过入党申请书，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毕业分配到重庆长江电工厂，扪心自问，工作是认真的，有成名成家思想，努力钻研技术。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对苏联提供的工艺参数作了有益的改动，在试制新产品的工作中小有成就，进厂一年半提升了四次工资，被推举为重庆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厂共青团团委委员，共产党待我不薄，我当时初恋的女朋友是共产党员，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本人从来没有想过反对共产党，做梦都不会有。但是1957年，一夜之间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个别人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歪曲捏造，不做调查、不容分辩、不经核实地给我扣上了右派帽子，送劳动教养。”

“在这种情况下，我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先后为四川磨床厂和四川消防机械厂建立了两个理化实验室和热处理工段，做了大量技术工作，还利用业余时间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多篇技术性论文和译述。19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解除劳动教养，但是被强制性地留在劳改单位就业。从精神到肉体，从形式到内容仍然被列为专政对象。”

“1964年举国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从1957年7月算起，我已经被关

押了七年，摘掉帽子、解除劳教也有三年了，仍然留在劳改单位，叫做‘就业人员’，连‘职工’两个字都不能用，看不到有任何出路。那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毛主席和共产党多次讲过‘给出路’，据说右派分子虽然被划作敌我矛盾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周总理在195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对大多数右派分子‘社会主义的大门是敞开着’，这些话言犹在耳。现实的遭遇却是从带上右派帽子那一天起就被列为专政对象，摘了帽子仍然是专政对象，究竟何年何月才能够回到人民行列里来呢？”

“痛苦之余，我在‘四清’运动中写了一份材料，开宗明义第一段话是：‘我不翻案，不因个人问题否定伟大的政治运动，明确表示1957年的后果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把责任推之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是我请求党和政府查明1957年的实际情况，了解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党的领导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希望在摘掉帽子多年以后得到党的理解和任用，或者说谅解和宽恕，允许我真正地回到人民行列。’”

“我自己认为这是信任党和政府、顾全大局、谨小慎微的真实倾诉，对共产党没有任何危害。材料交上去以后，劳教单位未置可否，既没有肯定的答复也没有批评教育更没有批判斗争。隔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来了，这份材料却成了所谓叫嚣翻案的罪状，在找不到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他听了以后沉思了一两分钟，缓慢地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人很老实。”又重复了一遍：“很老实。”

他接着说：“1957年，我和他都是矿党委委员，因为对一个党员的处理和党委书记的意见不一致，他被划为右派，想不通，不认罪，扬言上告，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后来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所以说……”

我没等他说完欲言又止的下文，便紧跟着说：“我明白，我不是有罪不认。是找不到犯了什么罪，不但我找不到，欲加之罪的那些人，也就是说四川消防机械厂、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西城区检察院、西城区法院、成都市中级法院等单位兴师动众、煞费苦心也没有找到，所以判决书上只概括了一条罪状，即‘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反革命言论’。思想也算犯罪？言论也能定罪？这恐怕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吧。”

略停顿了一下，我继续说：“被判了罪而没有认罪是很痛苦的事，我愿意认罪，就是找不到犯罪事实，不知道该怎么认。只要能够举出具体事实，是罪我就认，是错我就改，绝不含糊。”

他听了未置可否，随后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关禁闭室的？”

我说：“去年夏天，准确地说是1968年8月11日下午5点左右。”

“为什么呢？”他继续问。

我说：“我投入劳改以后，没有违反过任何监规纪律，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也没有想过逃跑。吃的是劳改队的伙食，住的是戒备森严的监狱。劳动上我是积极的，进监狱一年多学会了大部分农活，春播秋收、栽秧捋谷、驾牛耕地、割草积肥，我没有落于人后。关禁闭室的唯一理由就是‘不认罪’。认罪需要一个过程，判处十五年徒刑意味着需要十五年才能够改造好，一进监狱就立地成佛，不现实吧？十三队去年来了一个犯人尹显慧，投入劳改没几天就在大会上表示如何认罪，怎么老老实实在地接受改造，结果找机会逃跑了，至今还没有抓回来（注：详情参见本刊上期刊登的《炮兵参谋尹显慧之死》）。“不认罪”不是关禁闭的理由，究竟为什么日夜戴着手铐关禁闭，要十三队的管教干部和指导员周金仁才知道，我搞不清楚。”

他很沉得住气，一直不打断我，等我讲完了，他慢条斯理地讲了许多大道理，让我好好改造，平时要服从监管干部的管教，努力劳动等等。

随后又把我押送回了小监，继续带着背铐关禁闭。

事后我才知道，和我谈话的这个人叫宋晓光，以前是某劳改煤矿的党委书记，文革中被批斗，据说犯了什么错误，被下放到苗溪茶场当一般干部使用，以观后效。人虽然被打倒了，原来的等级高，

威信还在，他说的话在十三队还有别人不可取代的作用。

过了大约三四天，下午出工的时候，狱卒徐绍华打开了小监的门。我是三工区的犯人，他是三工区的主管干部，关我禁闭那天他在场，但是自从我关进来以后，九个多月没有见过他的面，这一天他开了门没说多余的话，只说了一句“出去劳动”。于是打开了背铐，带着我上了付家坪工地。

山上的犯人正在栽红苕，看见我来了，不由得露出惊讶的目光，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徐绍华到工棚歇凉去了，犯人值星员许诚给我安排背红苕藤的活路，我拿起背篋往苗圃走去，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好久没到这方来……”（《好久没到这方来》是一首非常流行的四川民歌）相熟的难友看我出了小监还是那么乐观，纷纷点头示意但还是不敢说话，个别胆子大的只说一句“长白了”，“长胖了”。我心里想，那是长期不见太阳的煞白，黑牢禁闭的浮肿。然而还是感谢难友们的一番好意。

我总算活着出了小监！ ■

抗战时期南开生活琐忆

——摘录自齐邦媛著《巨流河》第三章“中国不亡，有我！”

按：齐邦媛老人的长篇回忆录《巨流河》在台湾出版后引起各方好评如潮。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历史，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一个民族的命运，齐老娓娓而谈的叙述不仅让人产生许多感慨，也给人许多启发。现将该书有关抗战时期她在重庆就读南开中学时的回忆部分摘录以饷读者。因是取自网上，错漏之处难免。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

我家随着流亡学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从西南山路来到重庆，刚入市区，中山中学就有师生五人被日机炸死，战争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之后七年，轰炸宛如随着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庆是我们流亡的终点，中山中学走了五百里，在自流井大庙静宁寺安顿、复学，弦歌岂止未辍，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广西、贵州学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亲在重庆四德里祖屋恢复东北协会（负责训练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资助，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后解散），但落脚不久，房子即被炸毁。父亲托人在沙坪坝镇外找到两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协会办公用，后来《时与潮》编辑部亦设于此。

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间，我们奔跑了半个中国的土地之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带着我坐车由重庆上清寺出发，送我去上学。

我们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车行大约二十公里，过了小龙坎不久，在一片黄土坝子上，远远地出现一群红褐色大楼，在稀疏的树木中相当壮观——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开展，莫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积极地向华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数年间，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大学透过游行呼喊自强，号召爱国抗日。校长张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坝乡绅捐地。各界捐款盖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学生。卢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后，国民政府在十二月一日正式迁至战时首都重庆。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

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长得很高，约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体型又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

长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抗日战争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与张校长荣誉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一位美国学者合撰 *there is another china* 一书贺他七十岁之成就。此书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汇编，哥大 *CroWn Press* 出版，中译为《另有表现的中国》，意指藉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乱不宁的年代，尚有另一个中国在日益进步，充满了高瞻远瞩的理想。

自一九〇四年只有七十五个学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激情到处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那五十年间，中国的灾难有种种的新面貌。外侮与内煎并存。抗日胜利，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老病缠身的他仍在国共之战中呼号和平合作建设中国。七十五岁那年去世，临终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

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挂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数万学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忆恩师

南开教育最令我感谢的当然是学业，那六年奠定我一生进修的基础。除了原有的学业水平，南开中学吸引了许多由平津来到重庆的优秀师资，他们受张校长号召，住进沙坪坝校园的津南村，直到抗战胜利，八年间很少有人离开。

津南村是我所见过最早的眷村。那一排排水泥单栋小房，住着许多令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如：数十年来令我追忆难忘的国文科孟志荪老师，最让学生害怕的冷艳数学老师张亚丽。还有教务主任喻传鉴的两位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也在南开任教：“大喻”教英文，“小喻”教理科。

南开向来注重国际性，所以英文教材难度很高，这是传统。理化方面程度也很强，学生上了大学以后，念物理、化学如入无人之境。数学也教得扎实，我们大概是当时最早教微积分的中学。我那时的功课很不错，只有数学不好，尤其是几何。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些是虚线、有些是实线？我的观念里只有实线没有虚线。

化学科的郑老憨则是个奇人。全校似乎很少人用他的本名郑新亭称他，他未教女中部，但我们每次听男生学他用山东腔背化学公式，又说他在宿舍里喝点酒给男生讲《三国》，都羡慕得要死。此外，他还说了许多鼓励“男子汉”的壮语。

地理科的吴振芝老师教初中的中国史，提到台湾时叫我们记得“鸡蛋糕”（基隆、淡水、高雄），我们就在背后叫她“鸡蛋糕”。高中时，她教世界地理，常带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书，给我们看世界各地图片，开启我们的眼界。那一年夏初，她的未婚夫乘小汽轮在嘉陵江翻覆，噩耗传来，我们几个女生从她的单身宿舍门下塞进慰问信，上面写着，“老师，我们和您一同哭……”从此以后无人称她外号。

一九四八年初，我在台大文学院楼梯上遇见她去看沈刚伯院长，直到她从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退休，我们都保持联系，在她生命末程，我也去医院见她最后一面。

我记得有一位数学老师姓伉，是创校元老伉乃如的儿子。他教得很好，在我们女生部十分有名。他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大家叫他“伉老二”，长得很高，未婚，同学们都觉得他很英俊，我不觉得

怎么样。抗战时期大家都穿棉袄、草鞋，他却独树一帜，穿着白西装。

那时，他对我们班上一位女生颇有好感，她是南开的校花，就坐在我隔一个位置上。我们经常有小考，仇老师就在我们座位之间走动，往来巡查，有时低头看学生会不会写、有没有问题。每次，当他伏身到那位女同学位置去看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怪相百出，挤眉弄眼、推来推去。我们那时用毛笔写字，都有砚台。有一位同学非常生气，觉得他太讨厌了，怎么光是看她，就磨了一盘墨在砚台里，放在桌角上，让它突出桌沿一点，仇老师走过时就撞上了，墨汁淋到白西装，大约有半个身子。他用天津话生气地说：“这叫么？这叫么？”意思是：“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女孩子这样整男老师，有时候好可恶。

影响我最深的是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册是著名的，主编者就是孟老师。初中时选文由浅入深，白话文言并重，“五四”以来的作家佳作启发了我们的新文学创作。高中课本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讲述各时期文学发展，选文都是文学精华。

孟老师教我高二国文那一年，更开创了中学课程少见的选修课，有高二全校的诗选（男女合班）、高三的词选。那两年我已长大成人，除了必须应付别的课程，准备全国大专联合考试之外，日日夜夜背诵诗词。今日静静回首，中国文学史中重要佳作我多已在那两年背了下来。

除了课堂讲授，孟老师对我也像个父亲一样，把认为我能看的书都借给我看，有时候他还会说：“今天我们家做炸酱面，你来吃吧。”那也是我记忆中好吃的东西。

南开的老师，以任何时代标准来看，都是注重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和中山中学许多被学生终身怀念的老师一样，他们都是在战火中由北方逃到四川，追随张校长的办学号召，同甘共苦的。

二〇〇四年，我们四十三班的五十周年纪念集里，受最多人追忆的是孟老师和郑老师（男生说当年有百分之四十的毕业生因为郑老憨而去投考化学和相关科系）。另有一篇传国涌同学《呼唤人的教育》，写物理名师魏荣爵的故事：有一位孟老师国文课的得意弟子——四十一班的学长谢邦敏，毕业考物理科缴了白卷，但在上面写了一首词述志，自思是毕不了业啦。魏老师评阅考卷也写了四句：“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学长考上西南联大法律系，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校园里流传着不少这样的故事，不难理解为何南开的老师们这么令人怀念了。

南开的体育教育也是全国著名的，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无处逃避。

最初，我以为垒球（当年甚少棒球）比较温和，适合我瘦弱的身体，谁知跑垒却需最大速度，我在饱受嘲笑之后，发现自己事实上是可以跑很快的。经过锻炼，半年后由“靠边站”的后备球员升为班队一垒手，初三那年竟然还成为女中田径校队的短跑、跳高、跳远选手。有位老师称赞我跳高、跳远像没事似的，“飘”一下就过去了。

我父母对我的体育表现实在不能相信。那一天，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去看我比赛，大约是一百公尺赛跑吧，她忧心忡忡，随时准备在我倒地时把我拎回家。至今六十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

其实，体育课还有一个噩梦，就是踢踏舞。

有位高老师教了我好几年体育，她长得很挺，身材优美。踢踏舞是必修，学生们很规矩地跳，我老是跟不上舞步，她手里拿着小指挥棒，常常敲我脚踝。还说：“你的功课这么好，脚怎么这么笨？”后来她到台湾，我们同学还去看她，我没去，因为被她打太多次了。我真的不会跳，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笨？我就是不会跳踢踏舞，她拿着小棍子是真的敲打，又很诚恳地说我笨，我也觉得很羞愧。一点也不怪她。

十八张床的闺房

整个中学时期，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是我们切切盼望回家的时间。——数十年来每到此日此时，我仍会期待有快乐的事发生。

南开中学因为建在郊区，所以规定全体学生住校，我家住在二里路外，也必须住校。那时，车辆交通几乎是不可能的，战时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我未听闻任何人家里有私家汽车。

女生宿舍每一间有十八张木板床，三排各六张，中间只容一人行走。床下有个小木箱放衣服。早晚自修比照上课一样管理，星期六下午三点半可以回家，星期日六点回校。

我住在宿舍六年，好似在庞大的家庭中长大，充满了团体纪律和个人兴趣冲突的记忆，最有趣的时间是清晨和夜晚熄灯以后。

战时，规模较大的机关、学校都以吹号定起居与上下课的时间。因为迁徙时买不起大钟，更梦不到电子钟。每天破晓六点，天还没有大亮，起床号吹得凄厉而且坚持。我们挣扎着从爬着臭虫的木板床上起来，尤其在冬天真是件辛苦的事。在操场上排成队的时候，山城的雾常常浓得看不清邻班的脸。早操之前，经常是女中部主任王文田训话。几乎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她说我们：“心里长草，头上冒烟！”不知为什么，多年后重提此训，大家都会哈哈一阵，开心得不得了。

那些年，不但女生怕她，男生也极怕她，胆子小的直到毕业都未敢走进女中部大门。我至今仍有一段未解之谜，像她那样冷峻的女子（我们背后称她为狮身人面像），女中第一班毕业、留学德国的可怕人物，怎么会在四十多岁去嫁人（名学者李书华续弦）？多年后。我四十多岁去纽约看她，她开门，我刚说：“您还记得我吗？”她就流下泪来，说：“哎呀，我怎么不记得你们这班淘气包呢？”那些年，她在雾中一开口，大家立刻忘记昨夜之梦，她的声音像小钢炮，用天津话说我们“野得没有救了”，怎么会用这么温暖的“淘气包”形象记忆我们呢？

更丰富有趣的宿舍生活是在有气无力的熄灯号之后。睡眠不一定随黑暗而至，没有大月亮的晚上，确知不会跑警报，就是那十八张木板床上的人谈心的唯一时间。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然憧憬爱情，课内课外的书，字里行间都找得到爱情的暗示（那时很少“明示”），诗词歌赋全是伤春悲秋的情境。但是在那时的中学环境，不允许“谈”爱情，更没有人敢承认有钟情的人，若是敢承认恋爱，大约只有开除了罢。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南开中学校舍里臭虫闹得很厉害。我们回家时，行李都不准进屋子，得先放在院子里晒，再把被子拆去洗，若有臭虫就丢掉，有时连书里面也都是臭虫。张忠谋先生的自传也写到南开中学的臭虫，提到他们向校方抗议的情况。

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掉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总不能把屋子拆去烫。晚上，宿舍在考试前会晚一两个钟头熄灯，我们挑灯夜战，就会看到那盏没灯罩、直接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的恐怖情景，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

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臭虫是无可奈何的，学校也解决不了，因为那时没有办法消毒。抗战时没有“DDT”，若有，就是神奇得不得了的东西。直到我们毕业离开，才脱离臭虫的威胁。至于蚊子、苍蝇，更不用提了。即使如此，南开已经算是很讲究的学校了，餐厅里还有纱罩。只是再怎么讲究，也挡不住困难环境里的卫生难题。回想我们的少年时期，没有一个人不是被臭虫咬大的。真是不容易。唉，那和日本飞机一样可恶的臭虫，也几乎是铺天盖地似的缠住了我们。是另一场噩梦，我若开始写它们，只怕停不了笔。那些年全靠年轻的血肉之躯抵抗。

李弥将军的战马

初一、初二两年，我的身体仍然瘦弱，还偶在冗长的晨间升旗训话时晕倒，成为同学的笑柄。天

气太热或太冷时，站久了有人就说，“看！齐邦媛快要倒了。”我也常常不争气真的倒了。

初二上学期快结束时，天气突然极冷，我们大多数人的脚跟和手指长了冻疮。那天周会在操场大雾中站久了，我又摇摇欲坠，站在我左边的同学李心娥小声说。“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捏捏就好了。”她在我手腕上捏了几下，又在我左额捏了几下，很痛。但是我即能站稳，且呼吸顺畅了。回到教室。她从书桌内拿出一个小瓶子，倒了一些小粒子叫我吃下。我居然违反父亲教我不可随便吃药的告诫，吃了她的药，而且整日感觉很好。

李心娥在初二上学期开学两个月后插班进来。那时全国各省逃难的人都涌向重庆，南开中学因应战时需要，随时收合格学生插班，我初一上也是在十一月参加小考即收的。

但是，为了维持教学水平，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若有三分之一课不及格即留级，二分之一不及格即退学，不管家长是谁都没有用。暑假后，全校成绩公开贴在行政中心“范孙楼”，红笔多的即是留级，这就是著名、令人战栗的“红榜”。我还记得有一年看榜时，他们挤得把楼板都踩塌了。

李心娥插班来的那天。导师带她到门口。大声说，“这是新生李心娥。”她实在很矮，排在我左手座位，我那时也是又矮又瘦。坐第一排。她站在教室门口那表情，羞涩畏惧，不就是我到南开以前已经做了六次插班生，每次进陌生教室的表情吗？她既排在我邻座，升旗、早操也靠在旁边，我就事事带着她熟悉新环境，尤其是课程进度，明天要缴什么作业等。她几乎什么话都不说，只是感谢地笑着、听着。直到新年前，某个星期六下午，在几乎走空了的宿舍，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哭泣。

那天下课，轮到我做值日生，扫完教室回宿舍去取回家小包，经过邻室，看到她孤单的身影，我恳切地拉着她和我一起回家。

父母亲自从在南京宁海路开始招待东北的黄埔学生之后，直到他们去世，将近半世纪都以素朴丰盛的北方饮食招待客人。到沙坪坝定居后，哥哥考上中大医学院，却一心想作外交官，重考入政大外交系。母亲鼓励他带周末无家可归的同学回家吃晚饭，她最受不了别的孩子没有家，吃不饱饭。

李心娥是我带回家的第一个客人，她和我一样瘦弱，更引起我母亲的关心。我们只知道她是云南人，爸爸是军人，调到重庆驻防，带她来上南开，妈妈没有来。从此，我几乎每周末都请她一起回家。母亲知道她被疟疾折磨所以长不高，对她更加关怀，为她增加营养，和我一样待遇。

一九三九年春天以后，日本飞机加强轰炸重庆，除了下大雨，天天来，连有月亮的晚上也一定来。民间赶修的防空洞只能挡爆炸碎片，若被直接击中则只有毁灭。重庆四周高山之上设立许多防空监视哨，空袭时便在哨前长杆上挂起一只红色灯笼，并且响起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敌机侵入一定范围之内，再挂一只红色灯笼，接着响起紧急警报，急促的一长一短的警报响彻山城内外。那种尖锐凄厉的声音，惊心动魄，有大祸临头的死亡之音，尤其月夜由睡梦中惊醒立刻下床，扎上腰带穿鞋逃命，那样的惶惑和愤怒，延续数年的警报声，在我心上刻画了深深的伤口，终生未能痊愈。南开没办法在平地上修防空洞，只能在空袭警报时立即疏散，每次周会就领学生念口诀：“一声警报，二件衣裳，三人同行，四面张望……”

我们女中教室后面是一些小小的沙丘。像千百个狐穴，跑出去时就三人找一丘靠着。天晴时，可以看到两翼漆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看它机翼一斜，肚子里落下一串串银色的尖锥形炸弹。有时，看到我们的驱逐机从反方向迎战，机关枪的声音在空中响起；有时则看到冒烟的飞机，火球似地向地面坠落。我们心中燃烧着对日本的痛恨，这样的心情，是我生长岁月中切实的体验，很难由心中抹灭。长长的八年，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没有安全感，连蓝天上也是暴力，怎能忘怀？

这一年六月。政府下令七月以后各校学生及老弱妇孺都尽量往树木多的郊区疏散，减少伤亡。有一天，李心娥对我父母说，她父亲邀我们到他驻防地一处名叫黄桅标的地方躲避一下，暑假后能上课再回来。我父亲问了她父亲大名及军区，知是云南军的一位师长，李弥将军。

暑假开始，母亲、我及两个妹妹过了长江，过江的时候，船夫嚷着：“挂球了，快点划，赶快拢岸！”由江岸搭上军车，车行约三十里到一个群山环绕的小镇外临时军营。李心娥的父亲戎装出来迎

接我们，我真想不到瘦弱的她有这么漂亮威武的爸爸。他第三天就到另一区防地去了，直到八月底我们回沙坪坝才回来。

在黄桷栏军区，我又有另一个颇可自傲的经验。住下后第三天早上。李心娥带我去骑马。幼年时在东北家里，爷爷有马，村镇之间多数男人也骑马，但那是我不可企及的梦啊……这天清晨，勤务兵牵来两匹大马，我们两人都比马背还矮。马兵说每天早上都须遛马，把我们这么小个的“娃娃儿”放在马背上，马都“不晓得”！

李心娥很明显的是会骑的，她一跃而上。而我，站在马旁——是师长的马，他们优待我，简直手足无措，想逃走。但见马兵微微一笑，一手托住我左脚放入踏镫，扶我抬身到马背，再把右脚跨过去找到另一边踏镫，坐稳在巨大的马鞍上，抓紧了缰绳。由慢步走（trot）到小跑，马兵一直用手牵着蛮绳，数日后我居然也敢跑马了（gallop）。三十里外的重庆仍在日机恶毒的“疲劳轰炸”下，成日成夜不能解除警报。而我。住在军营里得了短暂的安全。每天早上在树丛土路上跑马，凉爽的风吹透了我少年的短发。

那种感觉是连梦中也无法想象的，马背上的李心娥，自信、稳定，和在学校判若两人。她说在云南家乡，随爸爸移防，必须会骑马。而我，在那样的缘份下竟然骑过李弥将军的战马……她所说的滇缅边境的崇山峻岭，激流狭壁引起我无限想象。我那些年常常希望自己是男孩，长大了也去从军，参加骑兵队，像二十九军的大刀队那种兵，从长城喜峰口到南天门，像我外祖母的蒙古祖先一样，跃马千里，绝不要蹲在沙丘旁，让那么小的日本倭寇到我头上来轰炸我。我们两个来自中国极北端和西南端的女孩，在敌人的轰炸下结成好友，那种真正患难与共的感觉，是太平岁月中长大的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夜间空袭时，跑了一半，在急促的紧急警报声中，靠月光找栖身的小沙丘，牵着拉着，互相喊着名字，坐下后听远远近近的炸弹，看三十里外城里的火光，两个十五岁女孩分担着不可解的恐惧。解除警报时多半已是凌晨两、三点钟。解除警报是长长徐缓的长鸣，好似在长长地吁气，庆幸我们还活着。数百人因为彻夜未眠，跌跌撞撞地往宿舍走，很少有人有兴致抬头看刚刚带来死亡威胁的天空。月亮已经落下，星光灿烂，而我那时并不觉得星空美丽。

初三毕业，李心娥随她父亲回云南。战争已逼近西南各省，沿着云南边境新修的滇缅公路需要大量的防卫军力。最后一次她到我家，带了一个锦缎包的玉镯交给我母亲，请我母亲为她收着。说是她母亲的纪念。她已经“不在”了。我至今也不确定是怎样的“不在”，平日她很少提到云南的家庭生活。抗战结束，除了她初回云南写过一封信。我家离开重庆，就断了音讯。十年之后，我家又“逃难”到台湾已数年，在反攻大陆声中，报纸上大幅报导国军留在滇越边境的最后守将李弥将军奉命撤退来台，转战万里终能归队，他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到立法院报告时，父亲约他相见，请他将玉镯还给李心娥，此时才知道心娥亦已嫁人，居住国外。李将军见到玉镯时十分意外，两人谈到当年在抗战中枢的重庆，信心与斗志何等旺盛，而今退守海隅竟是这般局面，感慨万千，只余叹息。

童子军日行一善的梦

我在初中三年最快乐的记忆是童子军训练。战时的少年比较勇敢，因为是真正的天真，爱国更绝不落后。

那年重庆被炸得最凶的一次大火后，我们选了一队童子军代表走路进城去共赴国难。走了大半程，只见士兵从未熄的火中抬出无数焦黑尸体由军队运出城，指挥者问带队老师：“这些娃儿（四川话）来做什么？赶快带他们回去！”

我们站在路边拚命哭，一面唱：“我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高……”据说回校后，老师被记了大过。但是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

我至今仍记得有次到歌乐山麓去练旗语的情形。我认真地传递敌情，觉得自己有用得不得了。又因为童子军必须日行一善，每次经沙坪坝镇上回家的路上，总希望能帮助路旁需要救助的人。但那时

的沙坪坝已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等师生数万人，已是有名的文化镇，轮不到童子军去日行一善，颇令我们感到无用武之地。初三开学不久，有外国贵宾来访，南开是首站，我和另一个同学被派去大门口站岗。那时我刚升为小队长。童军服（即制服）肩上钉了一卷绳子之类的标示，扎上鲜明的紫白二色南开领巾，手持童军棍，自以为是在做很重要的事。那天，恰好张大飞由重庆丢我家——他已开始飞驱逐舰与日机作战，经过南开门口，到家后对我母亲说：“我刚才看到邦媛在校门口站岗，她的胳膊和童子军棍一样粗。”

我听了不以为意，所有的人都说我太瘦，我反而说胖的人俗气。那时的我，对外表美丑毫无自觉。剪个男发，从不照镜子，甚至对男女有别的种种也很不注意。我的堂姐保冈恰好相反，人长得漂亮，在中山中学读高二，据说是校花。暑假回家。整天照镜子，很看不上我的不修边幅，对我说：“你的童年怎么这么长？”

整个初中时期确实似童年的延长，但从小到处转学的我，从此进入稳定的成长期，在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中，得师长之春风化雨，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

那年开学前，妈妈在镇上给我订做了几件浅蓝的和阴丹士林布（洗一辈子也不褪色，到台湾后几乎没看到过）的制服长衫，因为我要上高中了，不能再穿童军服了。

有一天早上我穿了一件浅蓝短袖的制服，从家门口小坡走上田埂，走那种长满了草的窄田埂需要灵活的平衡，两旁的稻田在大雨后积满了水，在一低头之际，我看到了稻田水里一个女孩的倒影，那是穿了长衫的我啊！我正伸着双手保持平衡，满脸的快乐与专注。头上的天那么高，那么蓝，变化不已的白云飞驰过去。十六岁的我，第一次在天地之间，照了那么大的镜子。

烽火烧得炽热，炸弹声伴着我们的读书声。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时，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跟今天在幸福环境成长的孩子比起来。较具忧患意识，懂事得早，心灵却也衰老得快一些。在那么艰难的环境，我们每天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晚上被臭虫咬，白天要跑警报，连有月亮的夜里也不放过。正因如此，剩下的一点时间就变得无比珍贵，老师说：“不好好做人，就会被淘汰。”就像不好好躲起来就会被炸死那样地戒慎恐惧。每天早上升旗典礼，老师们总会说些鼓励的话，南开给我们的这种“敲打的教育”，深深影响我们。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连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炸弹下的文艺青年

一九四〇年暑假，我看榜知道已由初中直升高中，功课压力暂时解除了。漫长的夏日。我常常穿过中大校园往嘉陵江边找小岩石角落坐下看书，那地方似是孤悬江上，没有小径，下面就是相当清澈的江水。

我大量地看古典小说，《水浒传》看了两遍，《红楼梦》看到第六遍仍未厌倦，因为书中男男女女都很漂亮可爱，和战争、逃难是两个世界。《西游记》里的人都不好看，《三国演义》，我想大约只有爸爸才看得懂……

升上高中后，脱下童子军制服，换上了长旗袍；春夏浅蓝，秋冬则是阴丹士林布。心理上似乎也颇受影响。连走路都不一样，自知是个女子，十六岁了。从此，功课不只是功课（数学仍是），而是学问，自觉人间一切课题开始由浅入深处处启发着我。

最感到幸福的是高二那年，吴振芝老师又轮到教我那一班的世界人文地理，那门课融合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源流和变迁。吴老师似乎更侧重历史与现势发展，有时她在黑板上画世界地图，希腊、罗马、迦太基；讲述英国的伊莉莎白一世和西班牙无敌舰队、哥伦布航海路线、南北极的探测、印度和中东、非洲的落后与神秘……每一堂课都似瀛海传奇深深吸住我们的目光。课本内容原已相当丰富，老师还常常带些当时稀有的大本洋书和图片给我们传阅，她声调低沉但充满了 feelings（只是“感情”是不

够的)，常似在检视偌大地球的沧桑。也许我们那班女生懂得，那二十三、四岁的年轻老师刚刚经历了人间至痛，才有那样深沉的声音吧。在成长岁月中读了这样一门课，使我日后对阅读、旅行都有适当的期待，借着少年时代的知识基础和渴望，可以探索别人文化的深度，而不甘于浮光掠影式地盲目赶路。

也是在这幸福的一年，孟志荪老师教我班国文，我他选了他首次开创的“诗选”，算一算，一星期有七堂他的课！

他那时大约已五十岁，在我们眼中，已经很老了。他长年穿深深浅浅的长衫，既不漂亮。也不潇洒（偶尔换黑或白色中山装）；他的声音带着相当干涩的天津腔，但当他开始讲课。立刻引人全神贯注。他的语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内容滔滔深广，又处处随所授文章诗词而激流奔放。五十年后，重庆南开同学纪念母校的书，写得最多的是国文课，几乎全写孟老师（三十多年前鹿桥在《纤情书》中也有怀念长文），有一位男同学朱永福的题目即是《激情孟夫子》，详记我们国文教材之成功全由于孟老师主编的态度，讲课“生动精采。充满激情，任何人听他的课都会被吸引，感情随他的指引而回荡起伏。进入唐宋诗文的境界，下课铃响后，才如梦初醒，回到现实。”他又说，可惜孟老师抒发感情、嬉笑怒骂的瞬间激情，女生班都看不到。

虽如此，但那时我已长大成人，又逢国难，很能了解孟老师为什么说若没时间读全本《史记》，又想读最好的，就先读司马迁写倒霉不幸人物的传记，《项羽本纪》就比《刘邦本纪》高明得多。从南京到四川这一趟千百里的流亡经验，也让我深深明白为什么孟老师教杜甫诗时，竟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一股幽愤悲伤，久久难消。

我浸润于孟老师的诗词课整整两年，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加上日后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英诗课上也背诵了百首以上的英诗，中英两种诗选中相异又相似的深意与境界，四年之间在我心中激荡，回响。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这样一个人。

《时与潮》杂志与辩论赛

高中时，我敢于主编学校的女中墙报并且动手用毛笔挥写一部份版面（我那清晰生硬的印刷体和后来教书写黑板的英文板书使我终身写不出潇洒的字），后来在辩论会上有凭有据地驳倒对方赢得胜利，主要是我有来自《时与潮》杂志社的最新资料，甚至有许多是英文原文、世界权威的著作。

《时与潮》是一九三八年由京沪撤退到汉口后，困坐愁城，几位东北知识青年请我父亲担任社长并筹钱办一本专门介绍国际现况的杂志，使人民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势，出刊之后相当成功。一九三九年撤退到重庆不久，印刷厂所在的那条街被炸毁，父亲找到一部旧机器。搬到沙坪坝外成立印刷厂、编辑部，从此安定出刊。

战时重庆真可说是人文荟萃的中心，除了政府人员，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学生，用各种方式来到重庆，不仅为了不愿作侵略者的顺民，还要前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参加长期抗战。

《时与潮》在汉口出刊不久即建立声誉，到重庆后增加编辑人手就顺利多了。最早的工作人员多是国内名校外文系的高材生，当时已有写作经验的刘圣斌、邓莲溪等先生由东北协会推荐而来（东北与华北沦陷以后，我父亲的工作由组织地下武装抗日转为文化与教育工作），加入阵容。到了沙坪坝，因地利之便，聘请中央大学教授贾午（立南）先生为总编辑，编译人员大多数由中大、重庆大学的教授兼任。四、五年后又公开招聘了许多译写好手，其中最年轻的编辑如吴奚真、何欣、汪燊定等。他们来台后在文学教育、经济方面都很有贡献，《时与潮》是他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后来，汪先生被中美合作善后救济总署派来台湾，我一九四七年来台大，他常在周末借吉普车带何欣先生与我去台北近郊游访名胜。他们回忆在《时与潮》工作时的挑战、抗日生活的苦乐，以及战后国内外种种变迁，话题源源不绝，数十年后仍常聚谈，趣味无穷。

当年为争取二次大战最新资料。《时与潮》派出刘圣斌先生驻在伦敦，邓莲溪先生驻华盛顿。负

责搜集、阅读每日报纸（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都有中译版权）和最新杂志、书刊，将重要适用的剪报、论述篇章加上大事分析寄往印度，由驻印度特派员沈旭宇交航空班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战时，英美援华军用与生活物资皆由印度转往重庆，张大飞飞行初期常被派往印度将美援飞机开回中国云南和四川，大约七天可到重庆。编辑部收到后，立刻日夜赶工中译，让《时与潮》的文章一直能保持半月刊的新知要求与时效性。

在那个时代，那样遥远的内陆山城，《时与潮》是很受欢迎的刊物，政府与民间都很重视，几乎每次出刊立即销售一空。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的战线后面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美国参战前后，半月刊经常加印四、五次，机器都热得烫手。《时与潮》选材之精准，译笔流畅，立论之高，在那时很少有刊物能与之竞争的。

《时与潮》办公室离我家不远，大约五十公尺，中间隔着大片水田，从家里可以看到办公室的灯光。每期出刊前，父亲为了熬夜看稿干脆睡在办公室，只要是父亲在那儿，我母亲就会看那灯光，灯光没熄，母亲也不睡觉。对他们这一辈的人来讲，这表示感情吧！我记得那灯光总是到凌晨一、两点才熄。

每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我奔出校门，走过镇上唯一的大街，右首一条小径引向那幢小小的白色房子，我总是先到编辑部看看爸爸有没有在里面。他周末两天由重庆城里回家，会先到社里看新到的资料和译稿，开会，定下一期篇目。我由沙坪坝经过时，一定会买一大包花生，到爸爸小小的社长室里，坐在他连夜看稿时睡的单人床上剥花生吃（他桌上有稿子，不许我们碰）。如果他不在，我就剥出一大把最好的花生，放在一个土烧小瓦钵留给他。剥花生大约是他那时代四十岁的人，尤其是政界，绝不会主动做的。有一天，他告诉我以后再不可以坐在他床上吃东西了，因为前一晚有一只老鼠到床上咬了他的鼻子一口。

我上高中以后，编辑部叔叔们大约觉得我该有超过吃花生的知识，对于我由浅入深的问题也比较看得起了，常将他们不用或用过的有趣英文稿子借给我看。有风土异闻、文化趋势等。后来，我随杂志社到防空洞去躲警报时，总编辑贾午伯伯最喜欢说，“来来，我来考考你。”他考我的那些章句，指引我读英文文章的重点，早已超出高中英文范围（南开的英文水平已比别校高）。如此日积月累，到大学联考时，英文科英翻中的题目是英军三十八师在缅甸深入丛林与我军会合的故事，对我而言是小场面，如果敢放肆的话，会当场大笑三声。

驻英特派员刘圣斌先生也教了我很多英国的事情和礼貌，他来台后做了立法委员，但不久就去世了。一位驻美特派员邓莲溪先生，从大陆来台湾时坐太平轮，失事丧生。他太太先来，行李也都运来了。他死后，太太打开行李箱，箱里有很多书，她就叫我去选，因为他是外文系的，我拿了一些他的书。睹物思人，回想他们在那间编辑室里日夜赶稿的情景，不胜唏嘘。

高二上学期，我被指定参加全校性的辩论社。开学不久，九月下旬即得代表高二出赛。

辩论的题目原是男女生的读书趋向之类，海报贴出后，有一天张校长散步看到了，说：“都什么时候了，天天跑警报，还教孩子们辩论这‘没有出息’的问题。”指导老师连忙把主题改为“美国会不会参战？”

这题目贴出去，在文化中心之一的沙坪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么严肃、重大的问题，高中学生怎么敢去公开辩论？原选出的六个人（正、反二方各三个人）也非常惶恐，都想退出。老师说。南开精神就是允公允能、勇敢接受挑战，不可以退出，叫大家加紧准备。

这实在是远超过我们能力的大问题，双方都动员了家长。反方：辩论美国不会参战。有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战时一家大报的主笔：我站在正方：美国会参战，有专门分析国际局势的《时与潮》作数据库。其实双方都有资料的后援。这已是同学间公开的秘密。我父亲觉得这题目对一群“毛孩子”来说太大了，只笑着对我说，“输了不要哭就好。”编辑部的叔叔们意见甚多，教我由原文资料中归纳为清楚的九项。分给同组三人掌握。整整一个月，我们三人储备了丰富的内容，而且必须保密，老师说，

这才能出奇制胜。辩论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至今仍记得上礼堂讲台时的紧张和下半场答辩时的冷静自信。我一生读书记忆力甚好，能将纸上资料适时用上。当时侃侃而辩，苦战之后我们是赢方。我有生以来首次知道自己可以不做哭娃娃，也第一次明白，胜利的代价不全是快乐。

赢了辩论后的周末，我由女中的“受彤楼”经行政中心“范孙楼”出大门回家。对面的高中男生教室窗口照例站满了“看”女生的人，他们看到我走来，大声地用刘半农《本事》的歌词改唱：“记得当时年纪小，你要参战，我不要……”然后喊：“快步走…一、二，一、二……”我几乎半跑步奔出校门。以后每次经过都疾行而过，因为他们又在喊：“飞毛腿……加油！”

三个月后，十二月八日，日本海军在凌晨一点突袭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西方同盟国家全体对日宣战，全球局势立刻明朗化，中国不再孤独。已独力抗战五年，困顿不堪的重庆立刻成为亚洲最大盟国中心。一切有了希望，我那中学生的“论点”全都正确，年轻的心确曾沾沾自喜了许久。

有一天在饭桌上，爸爸静静地对我说，“你赢了辩论会可真不容易，可见读书已知道重点。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能说什么，而是能想什么。”父亲一生常在我颇为自满的时刻说，“可真不容易啊，但是……”引领我进入深一层思索，虽然当时有悻悻然之感，但我一生处逆境时，多能在不服气之后，静静检讨，实得之于父亲的这种开导。

《时与潮》的业绩蒸蒸日上，除了政论半月刊，后来又增加《时与潮副刊》（月刊，介绍生活、医药、社会等各方面新知）以及《文艺双月刊》，创刊后销路也很好。同时，又获美国驻华大使出面将《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中文版授权给《时与潮》出版，当然也广受欢迎。

另外，编辑部以特约和兼任方式聘请文学界、学术界著名作者中译许多英、美、法文著作，如：以分析现势及历史为主的《法国的悲剧》、《巴黎地下二妇女》、《罗斯福传》、《拉丁美洲内幕》、《世界战中的印度》等数十种专书，风行一时。纯文学作品中，最畅销的是《高于一切》（this AbOVE All），描写英国一位护士和军人的战争生死恋。故事动人。畅销到几乎人手一册。这本书还在翻译时，我已先睹为快。我经常去编辑部凑热闹，当他们休息时，会把原文书借我看，由于只有一本，还是从印度经“驼峰”运来的，万分珍贵，我像秃鹰一样趁他们工作的空隙抢读，有几个晚上我把书带回家，第二天清早赶快去还，因为人家要工作。

除了出版，父亲于一九四一年初春在沙坪坝大街上最好地点祖屋设立“时与潮书店”，宽敞明亮。除了陈列自己出版的书刊，也齐备古典作品及战时能搜集到的各种书刊。因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欢迎学生翻阅，有的书甚至翻破再补。战时，许多学生无钱买书，坦然地去“时与潮书店”一本本翻阅，吸收知识。有些人说，那真是一座最“跟得上时势”的图书馆；也有人（如赵淑敏）回忆，说那是她的启蒙学校。

每周我由南开回家的路上必去“时与潮书店”还书，回校时再去借取新书。只要是能读的书，我很少遗漏。国共合作那几年，有不少俄文中译作品。除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令我敬读膜拜之外，记忆深刻的还有高尔基的《母亲》，另一本《露西亚之恋》，只记得书名很吸引我，内容、作者则忘了。当时左倾文坛捧得最厉害的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A.OStrOVsky）著，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一个工人的自述，那种强烈鲜明的政治意识是当时的我读不懂的。二〇〇二年左右，我突然在台北书市看到这本书，如遇旧友，捧回再读。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产党政治狂热将我们赶出大陆，而他们自己也在各种大同小异的狂热中自相残杀多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尘，真感百年世事不胜悲。

有“时与潮书店”这样又大又新的书库，我读遍西方名著的中译本。当年敢译书出版的，多数是中文根柢深厚又研究西方文学的文学、教育界人士。在电视出现前的岁月，出版界没有生存的威胁，彼此竞争亦不大，出书是唯一能出头露面的方式，可以建立真正的社会地位。出版界的编辑者都有相当高的眼界与权威，不屑仅以销路为考虑。但是那时的白话文比较拘谨，不似今日的轻松流畅。

战时因为纸张质量不好、印刷困难，有一些真正令我感动的书，多翻几次就出现磨痕。高中毕业

后等联考发榜那段时间，我买了当年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恭谨地抄了一本纪德（Andre gide. 1869-1951）《田园交响曲》和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的诗合集《汉园集》，至今珍存。字迹因墨水不好已渐模糊。简帛办的大雁出版社在一九八九年春季出版了仿古典线装本的何其芳《画梦录》，我也是以重逢老友之心珍藏的。

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时与潮》带给我的影响极为深远：既奠定我一生追求知识的基础，也打开眼界，学习从宏观角度看事情。这是我最感谢我父亲的地方，虽然我是女儿身，但他对我的教育非常认真。

大轰炸

生命充满反讽，今日思之，确实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时。我开始谈文论艺是在晴天和月夜逃警报的时候。初中时期思想单纯，常在疏散四郊时讲一讲课本上的难题和同学间的小喜小悲。虽然害怕，有时觉得不上课（尤其早上的数学课）出去跑跑也很有趣。但是。跑掉的课都会在昏昏欲睡的晚自习时补上。高一那年轰炸得最厉害，伤亡惨重。《时与潮》社在政府号召下，也在山坡下修了一个较坚固的防空洞，里面置一张小书桌和许多木凳，可以容纳二十人左右。装了电灯，备有水与干粮，让编辑部可以一面躲警报一面赶稿子。父母亲也叫我空袭时立刻由小径穿过稻田回去躲警报，学校亦鼓励高中的带初中三、五人到安全地方躲避。我常带爸爸好友洪兰友伯伯的女儿洪蝉和洪娟回去，解除警报后顺便回家吃一顿饱饭再回学校。防空洞外，死亡的威胁不曾停歇，但在活着的分分秒秒里，听大人们谈论时局、分析时事，对我都是宝贵的启发。那时，轰炸的声音在耳内回响，但防空洞内所读书籍的内容也在心里激荡。回校路上，常是我讲述书中故事的时候，这大概是那个年代舒抚恐惧的唯一方式吧。

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闻、目见、身历种种历史上悲壮场景，许多画面烙印心中，后半世所有的平静及幸福岁月的经验，都无法将它们自心中抹去：这当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岁到二十岁，在我全部成长的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

回忆六十年前种种暗夜恐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重读抗战历史，即使是最简单、一日数行的《民国大事日志》（一九八九年，台北，《传记文学》），翻到一九四〇年八月，除国际要闻、前线战报外，记载着：

九日：日机六十三架空袭重庆。

十一日：日机九十架空袭重庆，被我击落五架。

十九日：日机一百九十余架狂炸重庆市区。

二十日：日机一百七十架又狂炸重庆，市区大火，民众损失惨重。

二十一日：日机八十余架空袭重庆。

九月十一日：日机四十四架袭重庆，被我击落六架。

九月十八日：东北沦陷九周年，李杜报告。东北义勇军上半年作战共三千二百余次，平均每日对日寇出击二十次。

十月七日：昆明激烈空战。

十二月二十九日：美总统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示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兵工厂之职务，美国将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

在他著名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今日世上已无处可寻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这是一九三三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 1900-1954）所著《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中的地名，举世闻名至今。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寇飞机夜袭重庆市，校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市民死伤约三万余人。

报导指出，日机投弹炸大隧道各面出口，阻断逃生之路，救难人员在大火中打通两、三个出口，隧道内市民多已在窒息之前自己撕裂衣服，前胸皮肉均裂，脸上刻满挣扎痛苦，生还者甚少。这一页页血迹斑斑的记载。可见日人之狠毒，这样的残忍，促使战时抗日的更大团结。这段历史上不容漏载的国仇，我至今仍感愤怒悲伤。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日机开始对重庆进行日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几乎每日一百多架次炸四川各地，有些小城半毁，其目的在摧毁中国人的抗战心防。一周之间，日以继夜，无六小时之间隔。重庆市内饮水与灯光皆断，人民断炊。无家可眠，但在这种凌虐下，抗战意志却更为坚强。此日，八十六架又来狂袭，在蒋委员长驻扎的曾家岩三度投弹皆未命中。同月三十日，袭黄山军事会议会场，死伤卫士数人，国民政府大礼堂被炸毁。

整个八月，在与南京、汉口并称为三大火炉的重庆，仲夏烈日如焚，围绕着重庆市民的又是炸弹与救不完的燃烧弹大火，重庆城内没有一条完整的街，市民如活在炼狱，饱尝煎熬。

有一日，日机炸沙坪坝，要摧毁文化中心精神堡垒；我家屋顶被震落一半，邻家农夫被炸死，他的母亲坐在田坎上哭了三天三夜。我与洪蝉、洪娟勇敢地回到未塌的饭厅，看到木制的饭盆中白饭尚温，竟然吃了一碗她们才回学校。当天晚上，下起滂沱大雨，我们全家半坐半躺，挤在尚有一半屋顶的屋内。那阵子妈妈又在生病，必须躺在自己床上，全床铺了一块大油布遮雨，爸爸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油伞遮着他妈妈的头，就这样等着天亮……。

那就是我最早青春岁月的场景。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却愈磨愈强，即使只有十七、八岁，也磨出强烈的不服输精神，也要发出怒吼。

千人大合唱

一九四一年的寒假在大轰炸中度过。开学后，南开合唱团每天抽一小时勤练由李抱忱老师指挥的“千人大合唱”歌曲。三月十二日先在大礼堂唱，后又加一场在重庆市中心被炸毁的废墟上搭棚架（后为精神堡垒广场），全城二十多个合唱团齐聚，同声唱爱国歌曲，希望让全城困顿的同胞听到，让全世界的人听到，让地下的亡魂也听到。我们唱着：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那一夜，歌声震撼云霄，所有人热血沸腾，眼泪没有干过，高声唱出积压在内心深处国仇家恨的悲愤。李老师多年后回忆当时情况：“我上台指挥时，看见团员后面是日机轰炸后燃烧倒塌的楼房，听见一千人雄壮的大汉天声。”那股歌声的力量，是太平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当晚曲“千人大合唱”会场出来，有几辆军用大卡车送我们回沙坪坝。在一个转弯，卡车后面门板被挤松脱落了，我们全都掉落地上，因为跌成一堆，似乎没人受伤，只听到一阵喊叫，大家赶快爬起来去追车子。掉下时被压在最下面的一位男生姓胡，是南开著名的钢琴天才，曾开过校内演奏会。我居然赶紧去拉他起来，急切地问：“你的手伤了没有？”这些年中，我偶尔会想起他，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不知他后来有没有成为钢琴家？

那晚，我们在残破的公路上一面追卡车一面笑，沿路流过的嘉陵江在月亮初升之时美如仙境，战火死亡阴影下的青春有了片刻喘息。那短暂的欢乐令人永生难忘。

南开校风除了读书风气盛。才艺、社团活动也很多，校内常有各种音乐会、合唱团。个人音乐会中，最著名的是女中音曾宪恩，她唱的《花非花》、《我住长江头》等直扣内心，有人称她为“天使之音”，令我们如醉如痴。五十多年后我参加一九四三级同学会，知道她一直在杭州音专教声乐。另一位难忘的是男高音朱世楷，他因为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而风靡全校，许多人迷他迷得快发疯

了，每次他唱《都纳故乡》就成为更多女生的梦中情人。四十年后我在南开旅台校友会遇到他，仍有些歌迷情结，白头宫女话当年，说我们女生曾多么为他着迷。他回到美国寄了一张手抄的《都纳故乡》歌词给我，大叹前尘如梦。他深受高血压之苦，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

南开的另一特色是话剧社，张校长创校后不久即成立，原意是演爱国剧激发爱国心，艺术文化是救国的方式之一。最早，张校长曾自编自导，一九二〇年代周恩来在校读书时曾参加布景工作并饰演女角（男女不同台）。我在校时话剧社倒也不只演出爱国剧，有一年毕业公演演王尔德《少奶奶的扇子》，主角鲁巧珍高我一班，平日穿着制服，清丽飘逸，在戏里却举手投足尽是成熟风韵，令大家惊叹。

南开的话剧社公演、音乐会和各种球赛常是沙坪坝盛事，很得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支持。坝上有一些共同的“明星”。走在那条唯一的街上很吸引注意。有一年，南开篮球队和同样常出国手的东北中山中学篮球队有一场轰动的比赛。中山险胜。我幸好已毕业，否则不知该为哪一队加油效忠才对。

永别母校

高中三年除了学业，另一项耕耘与收获是友情。人长大了，志愿渐渐成为友情的要项，从初一升到高三都在同甘共苦的人只剩三十多位，其他人大半在高二时上了理组，我和十来个人分到文组。

一般说来，文组的人是理科不行但文科也未必更好。我的国英文分数高，一直被选作墙报主编，又得过几次征文比赛名次，在不分组的宿舍里，熄灯后讲书里的故事或电影颇受欢迎，保住了几位理组的旧友。

我大约一、两个月进城看一次电影，如《茶花女》、《月宫宝盒》、《出水芙蓉》、《晨之翼》、《天长地久》……等。有一次谈论《茶花女》中演嘉宝（Greta Garbo）情人的劳勃泰勒，我说他只是个小白脸而已。引起他的众多影迷愤怒，问我：“那你认为谁最漂亮？”我说亨利方达，日后她们称他为“你的小黑脸”。想不到来台湾后看到他在《金池塘》中演老人，颇为伤心。因为他的缘故，我也一直很欣赏他那有头脑的女儿珍芳达。

有一次讲《天长地久》的故事，竟惹得她们一片唏嘘。五十多年后，我去北京与她们重聚，尚有人提起当时情景。半世纪中多少世间悲欢涯过了，她们竟然还记得中学时的那种爱情向往。当年黑暗宿舍中的少女，怎样走进政治风暴又如何从文革脱身，我都不敢详问。

在那段真正是联床夜话的岁月里。我和余瑜之常常上下句接续地背诵孟老师诗、词课上的句子，有时我会加上何其芳《花环》诗中名句：“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我说你是幸福的，小铃铃，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有时也吟诵卞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等等。自从知道何其芳是北大哲学系毕业，卞之琳是北大外文系毕业，他们的诗句就更令我着迷了。

今日想来，令我们这几个十七、八岁中学生惊喜得如天外纶音的诗句，如写少女眼泪的“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很可能是受了丁尼荪（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的名诗（眼泪，无由的眼泪）（“Tears, Idle Tears,）中首句为“眼泪，无由的眼泪，我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Tears, Idle Tears I know not What they mean”）的启发。中国诗词里当然也有如此意境，但新诗文字的表现清新脱俗，在那艰困闭塞的时代，对我们来说如同天籁。

上了高三，除了加紧准备联考，同学间也渐渐弥漫着毕业的离情。对于南开，我有说不尽又数不清的怀念，尤其是对同学和老师，因为住校，大家都有感情，想到要离开学校，我不知哭了多少天。

快毕业时，老师指定我写一首级歌。我写着：“默林朝曦，西池暮灵……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都是那时一个高中女生倾心读了两年古典诗词后，所能作出的幼稚多情的歌。我们的音乐老师为它配上曲谱。优雅动听，在女中部立刻传唱，颇受喜爱，她们把我当成一个小英雄

似的。谁知男中部的老师人多，他们选了一位男生写的“数载弦歌辍诵声，纷飞劳燕漫飘零……破浪乘风勉自今。”

后来在毕业典礼上唱级歌时，很多女生不愿意唱，我的几位死党竟然也哭起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当时的心情半是惜别半是气恼。我自己半世执教，当然明白那时代的级歌必须沉稳。因为由南开毕业是件很庄重的事啊：想不到在毕业五十年的《四三通讯》刊物里，仍有一位王世泽学长记得这事，写了一篇《关于级歌》的追忆。

夏初毕业后，大多数人都留在学校作联考前最后准备，学校并没有任何补习，老师都已放暑假了。我们住在宿舍里，各种规矩照旧，起床号、熄灯已不再令人痛苦。战争打到第六年，只剩下贵州、四川、西康、青海、新疆和云南仍未落入敌手，每天的战报都是在失陷、克敌的拉锯状态胶着。我们除了考上大学外，别无盼望，渺小的中学女生梦中都没有“乘风破浪”的场景，晚上熄灯后躺在木板床上说不完离情依依。只是没有鼓舞前途的话。

有一夜，我由梦中惊醒，突然睡不着，就到宿舍靠走廊的窗口站着，忽然听见不远处音乐教室传来练唱的歌声：“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那气氛非常悲伤，我听了一直哭。半世纪过去了，那歌声带来的悲凉。家国之痛，个人前途之茫然，在我年轻的心上烙下永不磨灭的刻痕。我日后读书、进修、教书、写评论文章时都不免隐现那月夜歌声的感伤。

大学联考

高三时，我决心考大学只填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中央大学因在沙坪坝我家门口所以不填，我希望上大学可以远行独立。据说男中部有人只填一个志愿，当年的南开精神颇为过度自信，但似乎也很少失败。我之所以选择哲学系，乃是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索人生深奥的意义。下定决心后，从此全心准备读哲学系，连我最敬佩的孟志荪老师劝我读中文系，我都不听，还力陈浅见哩。

我记得我们准备联考，也和现在的考生一样辛苦。南开中学里有很多学生更辛苦，因为战时他们的家不在四川、重庆，只能以校为家，所以学校的自修室每天开放到晚上九点，愿意的学生可以留校读书，直到联考结束。不过不许点灯。因为怕火灾，虽如此大家还是喜欢去学校读书。我家就在沙坪坝，但我也到学校念书。当年联考也是七月，重庆是三大“火炉”之一，夏天极酷热，我记得铁椅椅背都晒得烫人，可是我们还是坐在那椅子上拚命读，有时坐着还想打瞌睡。靠着英文和国文递补了奇惨的数学分数（只有四十八分），我考上第二志愿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但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竟在发榜后不久，来信通知南开说我的英文分数高，欢迎我前往就读，但是我当时一知半解，执意“追求真理，思考人生”，决心读哲学系。谁知一年后在武大受朱光潜老师劝告，仍转入外文系，一生命运似已天定。终我一生，人生、真理似乎都非我思考能解。

关于南开，使她扬名于世的是校友。南开著名的校友，自第一届的梅贻琦（一九〇八年）和喻传鉴（负责校务数十年）以及后期的周恩来、吴大猷、曹禺（万家宝）、吴纳孙（鹿桥）……等，名单可以达“一里路长”。一九四九年国府迁台时，南开出身的有大使十多人，部长四、五人。近年在自传中叙述南开中学影响的有张忠谋和大陆总理温家宝。南开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校友更多，但这已在我成长教育回忆的“感情范围”之外。

我认为在南开中学已满百年的历史中，家长名单似乎更为精采，几乎可以自成一册近代史。最早的梁启超、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胡适、张学良、张自忠、翁文灏、汪精卫等，抗战时，在重庆南开我与马寅初的小女儿马仰同班三年，抗战时期的名将（大约都在四、五十岁年纪）泰半都有儿女送来，因为住校，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同学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别人的家世，因为大家都差不多。

我至今记得当时与华北名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比我高一班)在宿舍谈文论艺的情形。抗战胜利后,国共战争的转折点是,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义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响应共产党喊出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后来我骇然地读到他的女儿是劝降者之一。在我迷恋诗词、神驰于文学,对政治除了抗日爱国之外几乎是“无知”的那些年,原来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来自云端的信

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的时代,沙坪坝六年,张大飞成了我最稳定的笔友。

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两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我家五、六次。我大妹宁媛已经上南开小学,小妹星媛每天也跟着去“玩”(她把小姐姐的书全背得出来)。那时的我是家中唯一爱写信的人,大飞四哥(在他家中排行)不驻重庆时,每周用浅蓝航空信纸写信来,他的家人一直联络不上,他说,我们就是他唯一可报平安的家人了。他写信如写家书,我因此万分感动,必回他的信,那些信如果带出来了,当是多么可贵的战时青年成长史!

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的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并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

他的生活何等辉煌,而我只有中学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初中时,我常抄些国文课本里感时忧国的文章如《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史可法《答多尔衮书》等。渐渐地也写些课外读的,女孩子最迷的《冰岛渔夫》、《简爱》,甚至《葛莱齐拉》这种“多情得要命”的散文诗,他似乎都很有兴趣地与我讨论,但每封信结尾都说要注意身体,不要让妈妈操心之类的训勉。

我上了高中,他已身经百战,信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凡是校内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周会的名人演讲,我办的墙报,寄前线战士慰劳信,为轰炸后重建新居的捐款活动等,他都很有兴趣。有时我也寄一、两本“时与潮书店”的好书给他。这些信,他说,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渐渐地,他写了更多关于《圣经》的话,并且很欣赏我抄寄给他孟老师诗选、词选的课本,他说这是他灵魂又一重安慰(多年来,他是唯一常常和我谈灵魂的人)。

他几乎和我平步修完孟志荪老师的诗、词选。他当然喜欢苏东坡和辛弃疾,说那种豪迈是男儿所当有。也同意秦少游的《踏莎行》结语:“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有大气魄,但是对于我很欣赏皇甫松《梦江南》:“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却不以为然,年纪轻轻,怎么喜欢这么苍凉的境界!

他的信,从寄到湖南的第一封写他入伍训练,到他由美回国选入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常常附有照片,从穿着棉军服疾行军到站在鲨鱼嘴飞虎战斗机前穿飞行装的各种照片,七、八年来也累积了不少。

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如果那能称为“一生”),这一切因为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1893-1958)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一九四一年,在云南的基地,他遇到了美国的随军牧师。多年来他陷于宗教与作战之间的心理冲突,在与这位长老会牧师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些纾解,到美国受训时与基地随军牧师朝夕相见,他们认为保卫家乡是正义之战,减少民间无辜的伤亡,是军人天职,给了他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使他能杀伐与救赎间求取一些心灵的平安。

渐渐地。他不多写战争的事,开始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但是仗要先好好打“绝不能让日本鬼子打赢”。他的语气中全是英雄气概,充满了张校长演讲勉励我们“中国不亡,有我!”的气概。

张大飞于一九三七年底投军,入伍训练结束,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

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漆着鲨鱼嘴，报纸仍旧称他们为飞虎队。

他到沙坪坝我家。妈妈说美国伙食好，他更壮了，也似乎还长高了一些。新晋阶中尉的制服领上飞鹰、袖上两条线，走路真是有精神！此次告别，他即往昆明报到。

由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那时地面上的国军陷入苦战，湖南、广西几全沦陷，空军是唯一令我们鼓舞的英雄。

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亚……”从此没人强迫他喝，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有一封信中，他告诉我：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迹，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人的脸，一脸的惊恐。他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坠下飞机中飞行员的脸了……我没有看见，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脸。

是的，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燎烧、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澈，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他又回到云南，一去近一年。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默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小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被打成右派的抗战英雄工程师李温平传奇

丁 抒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我实行封锁政策，以阻止盟国援华物资进入。八月间，云南省主席龙云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向蒋介石建议，把云南作为抗战后方，由地方出资中央补助，修一条由昆明经滇西到缅甸的公路，连通仰光港和印度洋，开辟一条新的国际通道，使在缅甸仰光上岸的

海外援华物资通过公路和铁路运往中国大西南后方基地。当时蒋介石就表示赞同。修滇缅公路一事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民政府迅速与英国政府商定，以缅甸腊戍与我国畹町作为滇缅公路衔接点。缅甸境内与中国境内各自负责承建。滇缅公路的东段，由昆明到下关，当时叫滇西公路，原系云南滇西省道干线，全长四百多公里，已于一九三五年开通。需要修通的是滇缅公路的西段，从下关至畹町进入缅甸。这一段路全长四百五十余公里，地势险峻、环境恶劣，穿越怒江，澜沧江，外国专家推论，修通这条路起码要六年时间，至少也要三年。而国民政府、蒋介石给云南的期限是一年。

龙云也认为兵贵神速，必须在一年之内修通，否则说不定国家都完了，公路还没有修通。

龙云这个彝族人用鸡毛信、手铐下达筑路飭令，并亲自兼任滇缅公路总工程师处的督办。一九三七年底，滇缅公路在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等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全线开工。龙云的滇军主力四万余官兵已开赴中原抗日前线，从沿途几十个县十几个民族征集的筑路民工号称二十万，其中不少是老人、妇女和少年。工程之艰巨，是难以想像的。海拔数千米的险峻山脉，怒江、澜沧江的深谷。尤其是将怒江上惟一的惠通桥由仅通人马的吊桥改成为公路桥，难度格外大。惠通桥横锁怒江，是滇缅公路的咽喉。十四根长达两百余米的主钢索，是八百多个民工每两个人一根杠子，拴着铁索，好像一条长长的蜈蚣，历经两个多月，翻越高山峡谷，沿羊肠小径一步一步跋涉五百余公里从缅甸抬回来的。

滇缅公路在惠通桥所在的龙陵县境内有一百多公里，龙陵县长王锡光把当地一个土司头子找去，一同走到怒江边的悬崖峭壁边上，把收到的龙云的鸡毛信和手铐展示给他看，说“如果不按期完工，我就拉着你，我们两个就从这个地方一起跳下去。”该县人口仅四万多人，一万多各族人民拼搏在工地上，在这世界上最崎岖、地形最复杂的高山峡谷、急流险滩中一米一米地筑路。每一天都有五六个、七八个人在工地死亡。惠通桥完工后，由下关经保山、龙陵、芒市至畹町，出国到达缅甸腊戍的路段长达千余公里的滇缅公路就全线修通了。整个工程仅用了二百八十七天，在山谷间架起的大小桥梁有三百七十座。滇缅公路的迅速建成令国际社会惊讶，各国传媒争相报导。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赞叹道：“这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有修滇缅公路这样的精神，中国不会亡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第一批六千吨军火由英国轮船从苏联的奥德萨运至仰光港上岸，再经铁路和滇缅公路运往中国境内。

大批美国援华的汽车运到了。一九三九年二月，三千二百多名南洋华侨机工，包括扮男装混入司机队伍的女性，先后回到祖国，驾驶货车在滇缅公路上奔忙。这是一条“抗日输血管”，七千八百多辆汽车日夜兼程，奔跑在滇缅公路上，将堆积在仰光港的国际援华军需物资抢运到中国大后方，其中最主要的是枪支弹药和汽油。

一九四〇年，日本军队一度封锁滇缅公路，阻断此通道达三个月。九月间公路重新打通不久，日军占领了越南的河内，滇越铁路和广西到海防的通道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成了我国惟一的国际通道，支撑着中国的正面战场。日军再次大规模破坏滇缅公路，以日本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大川内传七少将为指挥官的“滇缅封锁委员会”指定一百架飞机从越南起飞轰炸滇缅公路。从十月至次年二月，先后六次出动一百架飞机对惠通桥狂轰滥炸。公路员工和民工随炸随修保证通车，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南洋华侨司机中有一千多人洒血牺牲在滇缅公路上。

一九四一年，中美两国政府决定全面修复被日军炸坏的滇缅公路。由美方供给修路机械和物资，中国负责施工。为与美方合作，需要熟谙英语的工程人员。国民党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局长急电重庆公路总处，指名调重庆公路管理处石工直属大队长的李温平博士到滇缅公路工作。

正如李温平在其自传《从机械筑路到定向爆破——我所走过的路》里所说的：“我没有想到从此我开始了具有意义的人生里程，那就是修复了滇缅公路后，我又被派与美军合作，修建中印公路。中

印公路即后来被称为直捣东京的举世闻名的史迪威公路，它在迫使日军无条件投降的伟大历史事件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李温平祖籍福建，出生于惠安县农村。在唐山交通大学学习时，日军侵略东北三省，积极参与抗日活动的李温平被同学推选担任唐山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组织过唐山市学联抗日大游行。一九三四年毕业后，他在郑州陇海铁路潼西工程段实习。不久获得美国费城宾夕伐尼亚大学通知同意入研究院进修并免费提供宿舍。他便停薪留职，于一九三五年初从上海搭邮轮赴美。在宾夕伐尼亚大学进修半年后，他又转到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因接受长沙湖南大学的聘书，于一九三六年底回国。行前取得密西根大学校方的同意，在中国继续其学业，完成博士论文。一九三九年，密西根大学正式授予他运输工程博士学位元。

在湖南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教的同时，他并就近受聘担任湘黔铁路工程局工程师。在长沙遭日寇轰炸，新建铁路工程被迫停工后，他被调到四川修建川滇、川中、乐西等公路。

到了滇缅公路，李温平带领技术人员和民工改歪线、降陡坡，整平路基，铺设柏油路面。他的足迹遍及这条公路。这是我国第一段沥青路面的铺设工程。过去每天只能通过三百辆汽车的土路，铺上沥青后一天可过两千辆。畹町至昆明过去要走一个多星期，现在只需三、四天。一九四一年共有十三万多吨军用物资从这里运往抗日前线。沥青路面浇筑完毕时，李温平获得了滇缅路局局长发给的奖状。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件后，缅甸亦被日军占领。日本进攻缅甸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切断滇缅公路。为保住这条对外通道，中国派出十万远征军越过惠通桥，由畹町出国门，直奔缅北重镇腊戍。此时，滇缅公路上几乎所有的汽车又都参加了这次运兵。

一九四二年春，在盟军史迪威将军指挥下，中国远征军配合英国军队攻打盘踞缅甸的日军。但因指挥失误及兵力悬殊，仅半年就全线溃败，史迪威将军步行二十天逃回印度。中国远征军遭日军包围损失惨重，六万将士埋骨异国荒山。

日军用缴获的美国汽车，运载着步兵，沿滇缅公路长驱直入，进入中国境内，两天中推进两百多公里，一直打到怒江边的惠通桥西岸。日军准备三个月内与广西日军会师昆明，继而直捣我陪都重庆。这时的滇缅公路成了日军的大通道。但是，由于守桥工兵指挥事先置 TNT 炸药于惠通桥上，布好引爆装置。当日军第 56 师团的特工队在桥头架起机枪扫射，企图强行过桥时，我工兵炸毁了大桥。日军“三个月内会师昆明，直捣重庆”的企图就此破灭。此后中国军队与日军以怒江天险为界，隔江对峙了一年之久。但很多华侨、特别是缅甸华侨被隔在怒江西岸无法逃身，惨遭日军杀害。滇缅路局驻惠通桥工程段的段长、工程师多人被日军搜索部队抓捕，押到江边开枪射杀。

这时，滇缅路局组成工程总队，李温平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兼副总队长代行总队长职务。任务是培训筑路机械施工驾驶员和维修人员，供反攻时抢修公路之需。

一九四四年初，全面反攻开始。中美双方签订了怒江战役协议，为便利军运，筑路工作先行。双方联合抢修滇缅公路。在云南保山的工程指挥部，负责长官、美方工程兵团薛德乐上校（Colonel Robert F. Seedlock）将其助手贝克中校和李温平博士叫去，要求两人各自回答：“从昆明至怒江边惠通桥七百五十公里公路，若全部改为双车道需开挖多少工料？”贝克中校和李温平分别把自己的估算数字写在手心里，再同时伸手摊在薛德乐面前。薛上校分别看后，当场对李温平说：“你是我的总工程师（You are my chief Engineer）！”李问：“为什么？”薛说：“您二位，一个是美军中校，多年在公路上施工；一个是中国的公路工程师。你们的估算数字相差不到百分之二。我相信我的助手贝克中校，更相信你这个留学美国又在中国公路上工作多年的博士。今后要在中国公路上和你们合作，我更相信你的估算，所以说你是我们工兵团的总工程师！”

就这样，李温平当上了滇缅公路抢修工程的总工程师。

李温平与桥工大队长黄京群率领一支精干的修桥队伍抢修惠通桥时，日军还在西岸顽抗，从山上向大桥射击，修桥队伍时有伤亡，抢修工作的艰巨和危险难以想像。司令员限令三十天通车，可是他们在美军协助下仅用了十五天就完成了任务。

滇缅公路抢修后，中国远征军二十万人渡过怒江，松山大战开始。在一百二十天里全歼了在缅甸的日军。

鉴于中国和印度之间“驼峰航线”之漫长而艰难，为加快对日本的反攻，美军驻华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向罗斯福总统提议，修建中印公路，从印度列多到缅甸密支那，再从密支那到中国云南腾冲、保山，从而接上滇缅公路，使盟军的援助物资得以从印度经陆路运抵昆明。与此同时铺设一条从印度至昆明总长度为三千三百多公里的输送汽油的管道。

中美两国在重庆秘密商定后，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开工。这是美军在二战中帮助中国的一项巨大工程，耗资之巨无出其右者。史迪威在印度列多的公路起点竖起一面大木牌，上写：“此为直捣东京之路”。

这一次，李温平又被委派与美军合作。他担任工程处副处长，负责与美军工兵团联络，包括工程进度、艰险地段筑路机械安排、施工、募集民工与劳务分配、民工粮食空投安排，并协助组装美军空运来的筑路机械等。

中印公路由中、美双方对向修筑。美（印）方段一千五百余公里，美军投入施工人员五万余人，印度民工五万人。中方段约一千二百公里，美方空运来筑路机械不计其数。

在工程遇到困难时，李温平向美方建议采用大爆破方法，使工期大大缩短。这是我国首次将爆破法用于公路建设上。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中美双方筑路人员终于在缅甸密支那会师。两天后，第一批军援汽车队于到达昆明。

八年抗战中，李温平参与了湘潭、湘黔铁路新线工程、川滇东路、川中公路、乐西公路、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黔桂公路、湘赣公路八条公路的修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颁发给李温平一枚抗日勋章和一份证书，上写“国民政府为李温平在协修中印公路中著有勋绩特颁发勋章。”国民政府军委会还颁发给他陆海空一级奖章一枚，执照一张。上写：“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二等一级代副总工程师李温平因协修中印公路著有功绩，今依陆海空军奖励条例第四条第六款，呈准国民政府给予甲种光华一等奖章一座，合发执照以资证明。”

另外美军总部奖给他锦旗一面，上面绣着中印公路路线和通车日期。为表彰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授予他一枚“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这时他已率队配合美军工兵团抢修黔桂公路，不及赴美领取。美方把它存于国防部五角大楼。

抗战胜利后，李温平奉令从重庆飞上海接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配给中国的一大批筑路机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前，李温平担任总队长的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机械筑路总队拥有当时全国一流的和数量最多、门类齐全的进口筑路机械。当局要求他将所有重型机械运往台湾。而他却悉数保管，连同总队的财产美钞、黄金全部移交给了中共。

一九四九年八月，李温平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长、总工程师。建筑工程部成立后，他改任建工部的机械施工总局总工程师，一九五二年在官厅水库工程中，他钻研出一种深孔药室法，使石方单价从十几元降到一元多，为国家节约大量资金。一九五三年被评为模范工作者而在五一劳动节那天登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

一九五七年，当年提议修建滇缅公路的龙云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右派运动中被中共打成“大右派”，全国声讨。时为建筑科学研究院某研究室副总工程师的李温平则成了工程界的“大右派”。人民日报特别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章伯钧直接指挥下，李温平在工程界捣乱》。

其实，李温平连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他不过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市的联络人，章伯钧宴请工程

界人士时，受邀者的名单是他提出的。所以虽然没有反党言论，却属于“骨子里反党”的异类。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去了。

李温平没有从此消沉下去。到了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见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汪洋。原来农场的土地全是覆盖着水的沼泽地，既没有排水渠，又没有交通道路，在那严寒的冬末春初，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在沼泽地里踩着没膝深的烂泥水用铁锹艰难地挖排水渠。李温平日夜思索，终于想出了一个“一炮成渠”的法子。建议得到农场领导采纳后，他设计了大面积排水系统的定向爆破法。在沼泽地里安上自制的土炸药，按设计的渠宽和长度，一天可以炸一华里的排水渠。经过两年努力，为农场修成了六万亩沼泽地的排水系统，形成网路，全部种上了大豆。

在建工部部长刘裕民的过问下，李温平在一九六三年离开北大荒农场，回到了北京。

一九七九年他的“右派”问题被“改正”后，李温平担任国家建材总局总工程师，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及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

不过一直要到一九八四年七十二岁时，李温平才获准赴美，在一个特殊的授勋典礼上与老朋友薛德乐会面。那时薛德乐不是上校，而是将军了。薛德乐将军郑重地将那枚睽违已久的“自由勋章”挂在了李温平的胸前。

李温平的这枚勋章，不仅记录着这位元元工程师的卓越功绩和他个人的光荣历史，更是中国人民悲壮的抗日战争的见证，十多年前笔者拜访李老时，他已年逾八十。今年李温平九十五岁了。我衷心祝福他成为百岁老人。

（数据来源：1994年4月李温平与丁抒在北京的谈话。李温平《从机械筑路到定向爆破——我所走过的路》，李温平赠，原载西南（唐山）交通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友通讯”第16期。）■

崔永元谈抢救口述史——柴静博客中的转述

……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了。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然后你发表心得。别听别人心得了。我们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口述历史)特别有意义。

中国的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经死去，有的正在老，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

我们做完采访，再做笔录，一校二校三校，当事人校，然后做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片子)。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屁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一辈子不给钱，半辈子吃不饱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想加入组织就不让你进，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在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的事都特别淡。

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诧异。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

我们可能会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

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片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同样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

我们想让这个时代变化，挺难。我们等着这个时代变化，我们也等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自己在发展。就是这样。（摘自柴静博客，来源日期：2010-5-20）■

右派情缘

李文书

按：李文书，1936年生，四川邻水人。1957年在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响应号召参加“鸣放”，画了四幅漫画讽刺剧院个别领导干部作风腐败，被打成“右派”。被遣送乡间劳动改造后，他在第一个休息日即向所有朋友发出信件，要求断绝与他的联系。不料，“绝交信”发出后，他竟收到一封公开向他表白爱情的信……

我和老伴王铮铮，都是邻水人，家住北街十段，她也爱唱爱跳，一九五〇年欢庆新社会到来，我们都是十段的腰鼓队秧歌队成员。一九五一年，我上了邻水中学初中部，一九五三年，她也进入邻中读初中，我和她，一个喜欢美术，一个喜欢音乐，都成了学校冯宗祥老师特别偏爱的学生。自然我们也成了好同学。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我考入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训练班。开学之前，我拿着录取通知回邻水去办户口转移，第二天冯老师请我上他家里吃中饭，还请了好同学王铮铮作陪，表示庆贺。他还鼓励铮铮同学向我学习，冲出邻水，一定要考入音乐学院。这或许是冯老师本人要走出邻水的愿望没能实现就寄托在学生身上吧？

一九五六年春季，王铮铮初中毕业了，要等到秋季才报考川音附中。冯宗祥老师有远见，要她提前到重庆准备。铮铮住在已在重庆工作的同学家。这时我已从演训班结业分配到了话剧团。我请剧院歌剧团的声乐老师为她辅导——当时的老师不收课时费，不像现在动辄几百上千。临到考试，选定两首曲目，由我为她手风琴伴奏。很巧，川音考场就设在我们剧院歌剧团的合唱室。由于近半年来铮铮经常出入剧院上课，与我往来较多，又都是邻水人，小姑娘又长得乖巧，声音又好听，同事们都认为我们是一对小恋人儿。其实都是冯老师最关爱的学生，自然是好同学，仅此而已。但同事们总是半信半疑。

八月下旬，我们话剧团正在成都演出，铮铮跑来告诉我，她已考上川音附中，到学校报到了。我很高兴，就带她去武侯祠逛公园，上馆子，吃了中饭又回头逛春熙路直到送她回川音。那时川音很小，几乎都是木瓦房四合院，同美院一样学生很少，花园瓦房显得很安静。铮铮领我进了她们的宿舍，女生宿舍来了一位小伙儿，当然是七嘴八舌笑语声声，说什么的都有却又听不清她们到底说的是什么。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又是学音乐的，叽叽喳喳就像一群小麻雀在林中歌唱。从此我在她们同学中留下了很深印象，尤其后来我成了五七小右，校领导、老师、同学凡是知道王铮铮的就知道她有个同乡同学是小右派。

一九五八年春节刚过，重庆保安路散了架的四川人艺，敲锣打鼓欢送下放干部去农村，又欢送话剧团被排除的异己调去南川文工团。过后就是剧院办公室姓伍的主任召集右派宣布处理。话剧团“反

党小集团”的赵大（赵锭环）送峨边劳教，范大（范国瑞）、谢大（谢明德）、王恒和我，歌剧团的张廷钧、郑波文、赖飞、龚巴村，美工崔京生，一共九名右派分子送南桐矿区建设乡农村，同之前送去的下放干部一块劳动改造。

在建设乡劳动改造，规定十天休息一天，自由活动，右派与下放干部同享。第一个休息天，我们右派结伴步行十公里来到万盛，当年的万盛是刚刚划为重庆市的煤矿生产基地，称南桐矿区。区政府以及一切区级政府部门都在万盛，当然万象更新。我们九个右派齐刷刷进了一家冷清的茶馆，各占一张小方桌，静静地写家书。我除了家书，还给每月必通一封信的二十来位同学朋友写了内容完全相同的信。告诉他们我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成了人民的敌人，现在农村劳动改造，我们的同学朋友关系从此一刀两断，不再通信。

绝交信发出后我的心也定了，总算对朋友有个交待。之后的两个多月确实没有收到一封朋友的来信，直到第三个月，繁忙的春耕春种季节已过，我们几个男右派被集中起来专搞积肥，就是每天到桃子凼的公共厕所、采石场粪坑去掏人粪，担回各自所在的生产队倒进积肥的粪坑。

在掏粪积肥过程中，有一天我收到铮铮同学从成都四川音乐学院寄来的信。这是自我给二十多位好同学好朋友寄出那封绝交信近三个月后收到的唯一回信。一看寄信地址当然知道是谁，但令我不解的是信封里还装着两小块同样大小的硬东西。我没有立即拆开，因为在担粪，手脏，就装兜里。

当我担到二郎峡上游口，放下粪桶担子，下到小溪把手洗净，回到口子上的黄葛树下阴凉处坐下，小心翼翼将信拆开，因为不知里面装的两个小东西是什么，不敢大意。拆开一看，是两颗同样花色的奶油太妃糖！这是当时最好的高级糖。我不解，有点诧异。当我把长长几页信慢慢读完后，才理解了这两颗奶油太妃糖的真正含意——她爱我，而且把几年前就萌动的对我的爱恋之情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

我被感动了，流泪了。当人们不知真相（就连我自己都不知的真相），把右派视为敌人，纷纷离右而去之时，这么一位小同学、小姑娘，居然向我表白爱情！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怎么办？

想了两天，决定找救星共产党。一来有思想问题必须向领队汇报，这是改造纪律；二来两个领队人只有董秘书信得过，他最了解我，我最信服他。第三天晚饭后，我就去把信交给他。董秘书办事确实认真细致，那么长的信他硬是看完了才满脸笑容，显出山东人的干脆痛快，操着山东口音大叫着说：“好哇！爱情就是力量，她能鼓励你努力改造，行！行！”

我急忙掏出那两颗糖说这是铮铮装在信封里寄来的，您吃一颗我吃一颗就算喜糖吧。董秘书把糖放进嘴里更高兴地说：“是个搞艺术的好苗子，想得很有寓意，很浪漫的。”

就这样，我的初恋在逆境中开始了。然而，是喜是忧是福是祸，是我当时想不到的，根本没去想，我们双方就那么天真那么单纯地开始了书信往来的恋情。而且双方都是初恋。

一九五九年，春种春播农忙一过，我们这支杂牌军又被调往两河乡政府背靠的大山腰上一处名叫田湾坪的地方修堰塘。在这期间，我接到铮铮来信，说她以优异成绩附中毕业了，保送升本科，专修声乐。一切升学手续办好了就回邻水看望家人，打算路过重庆专程到南桐两河乡来看我。我当时还是在劳改中的戴帽右派怎敢接待？所以就叫她不要来，待摘帽后再说，我只能在信中祝贺她的升学，为她高兴。

一九六〇年六月底，铮铮来信说她已回邻水过暑假，希望我能回去见上一面。这个见面我们早有计划，我已经把每月两天的休假日集存了十天，又是农闲时节，我请了探亲假，十分愉快地上路了。

回到邻水，得知两件大事之后，使我失去了初恋的兴奋和冲动，久久不能从伤痛中走出来。一件是我的大哥下肢瘫痪不能站立走动了；一件是铮铮父亲也被打成右派，而且不到一年就在劳改中去世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大哥同我一九五八年在二郎峡写大标语一样，在邻水县城大街小巷、城墙崖壁书写宣传三面红旗的大幅标语口号，在酷暑烈日下还没干到一礼拜就倒下了，高烧不止。邻水医院把

他当感冒医治，退烧药用尽仍然高烧不止，这才往重庆送。先在临江门川东医院（现在的重医附二院）住院就治，什么病仍无定论，两天后转高滩岩西南医院才得出结论是脊髓炎，但为时已晚，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一小段中枢神经高热坏死造成双下肢永久瘫痪。就其病因，医院的结论就是长时间在酷暑烈日下劳作所致。我的天呀！当年大哥才二十多岁，就这么废了，还有两子一女，大嫂又无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铮铮的父亲是邻水县邮局的局长，抗战时期由湖北逃难至重庆就搞邮政，抗战胜利后拖家带仔来到邻水仍搞邮政，解放后就任局长。时至今日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被打成右派的。本来就是长期的肺结核，哪经得起上山劳改的折腾。不到半年病情严重，放回家来就一命呜呼。留下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一堆未成年子女，三男三女。老大铮铮靠助学金和远方亲戚资助才读完了音乐学院，未成年的弟妹为了生存各奔东西。母亲靠捡煤炭花度日养活自己和年幼的么女。右派局长死后没有葬身之地，当年邻水没有火化场，就软埋在南门外山梁上一处“棺山”。所谓“棺山”，就是穷人死了无土地埋，便由政府划出一块山地来共用。这个“棺山”解放前就有了，又名“乌龟背”，就是在一座很大的卧态乌龟石刻背上竖起一块大碑，上面刻有为孤坟野鬼安魂的碑文，也是国民政府或者还早一点的满清政府立下的，因碑文和日期早已风化。我和铮铮专程去了乌龟背寻找她父亲的尸骨，根据她母亲提供的线索，我们找遍了乌龟背也不见踪影。最后我掀起一块石板，有点像她母亲所说的模样儿，发现石缝中有一根人的小腿骨，还能看见被野狗啃过的牙齿印，这是右派局长的吗？不能十分肯定。但我们还是拿着这骨头祈祷默哀，祝愿父亲在地下比在地上过得好。

为了不影响的“改造”，这两个悲剧发生时他们都没告诉我。大哥非常理智，他说当时告诉了也白搭，难道会允许一个正在劳改中的右派分子回家探望病人？那是痴心妄想。我很遗憾，感到非常对不住两家亲人。在这种心情中，初恋的初次相聚自然是黯然失色，加上当时是饥饿年代不能久留，我们就提前返回。

在告别的前一夜，我已工作的妹妹专门把她的单身宿舍让给我们好好叙叙，过一个激情燃烧的初恋之夜。这是一个难忘之夜，不眠之夜，有说不完的话题，有永不满足的相亲相拥，如同腾云驾雾一般瞬间就天亮了，我们该走了。

汽车下午发车，深夜才到达重庆，我们就近住进了团市委招待所。因为一个多月前我在大田湾体育场搞展览就住在这里，同管理人员交上了朋友，深夜敲门他们一点不见外，安排好住宿还送来两个冷馒头。之后的两天，我们就在重庆逛山城，游朝天门、大礼堂、解放碑等等知名胜地，进出“心心”、“冠生园”吃点高价好吃的，小什字的“九园”大包子就是我们的早饭，一人一个，不敢多吃，太昂贵：一块钱一个，当时的一块钱比如今的一百元还值钱。把我身上带的钱全花完，为的就是初恋的痛快。

第三天晚上，这对初恋情人在菜园坝火车站相拥告别，互祝美好的明天，然而这个明天却长达一十六年！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为了对大庆有所表示，就来了个战犯大赦，末代皇帝就是那次出狱的。还有就是摘掉部分右派的帽子，这是第一批。九月我们全体人员下到田湾搞秋收时宣布的，我在其中。也是同戴帽儿一样，召集全体人员开大会，由负责人拿着写好的名单，口头念一下就完事儿，还是没有任何书面文书签字盖章划押按手印。好像小事儿一桩。可我们右派女士先生们却自作多情，认为这是了不得的非常大事。有的流眼泪写家书，有的握住颤抖的手哆嗦今后要如何如何更上一层楼，我还想得更美妙，明年四月刚满二十四岁争取考上中央戏剧学院。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又是一次毛泽东愚弄百姓、欺骗无辜，玩弄的把戏。

摘了帽的右派好像还是有所不同，宣布后没几天我就得到一件最大的“礼物”，躲过了最初几天的饥饿灾难。十一大庆即将到来，公社食堂就没饭吃了，为了吊命，就把谷子不去壳用石磨磨成粉掺合在切碎的白萝卜叶子中做成粑粑来吃。第一天吃了拉不出屎，第二天吃了第三天拉屎就要用手指抠，

不要说有痔疮的人，就是没痔疮的也是抠得鲜血直流。就在这时候画画又救了我，叫我去万盛南桐矿区文化馆画宣传画，为了庆祝十月一日，为了鼓吹人民公社大跃进，从国庆十周年大庆到六〇年元旦、再到春节，要掀起一个更比一个高的庆祝高潮，宣传画成了高潮的主要活动，我们从九月中画到来年一月底，一画就是三个多月。不仅躲过了吃了拉血的糠馍馍，而且还吃得好，吃得很好，好像又回到了剧院那种好日子。由于是大跃进，我们也没日没夜地画，而且是大画，立在大街上几米高、十多米长的巨大宣传画。大跃进的气氛处处都不能离开一个大字，为了这个大字就得没日没夜地干，大干快上我们也一样。不一样的是公社干活吃的没保障，这里干活吃得蛮好。且不说每日三餐在区委干部食堂鸡鸭鱼肉样样有，就是晚上加班也是糖果糕点堆如山。寒冬腊月还烧起大炉子取暖，熬上一壶咖啡，泡上一杯香茶，神仙过的日子！

我画的三幅巨型招贴画也不赖，第一幅临摹的北京农展馆前农民击鼓秧歌群塑，第二幅画的毛泽东领导各族人民大步向前的群像，第三幅拼凑的工农兵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头像，以及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多装快跑快跑多装烘托的热闹场面，就凭这三幅画，文化馆的同仁没把我当右派，就是区府的官员审查后也为我鼓掌。拿到大街上去挂起，不仅招来了赞美的眼光，还为万盛的十年大庆高潮增色添彩。我第一次感到作个小小御用吹鼓手的骄傲。

这时我才想到应该去照相馆照张相来留作纪念，摘帽右派第一春嘛！我就有意穿上肩头打补丁的黑色夹克，侧身向右看，正好镜头对准右肩，既突出了补丁，又突出了“右”。还有一张照片是工作之余文化馆的摄影师为我拍的，场地选在小河边的一块岩石，我正从岩石下往上爬，身后是滚滚波涛。当时没多想什么含义，可是到文革批斗我时就拿它说事儿，说我把反右比作陷阱，要从陷阱里爬出来……

一九六〇年七月底，我接到铮铮返校后第二封来信，信纸上有泪痕和被泪水模糊了的字，沉甸甸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回校后学校找她谈了几次话，要嘛与我断绝关系，继续留校读本科，要嘛与我继续保持关系，就分配边远山区工作。她不知该怎么办。

我一看问题严重了，我这个右派在她们附中同学中早有议论，早就是传开了的，只是同学们都很年轻，不知政治斗争水深水浅，还有人羡慕她找了个漂亮小伙儿——我的那张摘帽纪念照片就在她同学中传来传去看。学院党委政治嗅觉很灵敏，早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只是在选择时机进行干预阻止。

我不知如何是好，十分矛盾十分苦恼。这时董秘书远在宜宾，要是他还在身旁，如同当年铮铮那封两颗糖的浪漫情书那样，给他看看、请他给个主意该有多好？两天后，我把信给了忘年交的右派老友宋清涛（歌剧团导演）看，请他拿个主意。他的主意是“缓兵之计”，即直接给川音党委写信表态与铮铮断绝一切关系，从此决不通信和往来。几年后看看是否有转机。忘年交还说，这对我们都是十分残酷和不人道的，但如果因为这事把她整到边远山区，那就是我也害了她，是帮凶，同样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事实证明，忘年交的说法是正确的。就因为出身不好，她们五六级的几个附中毕业生就被分配到酉阳秀山，还有大凉山，窝了一辈子。

我听了忘年交的话，直接给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去信表决心与该校学生王铮铮断绝一切关系，从此不再往来。

那天是休息日，我给川音党委写好的信亲手投进了狮子滩邮政所的邮筒，好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我的心不是地，而是一湾冰凉的水，很不平静的水，石头落下更是击起了浪花滚滚，滚滚浪花。我无心在狮子滩游荡，便沿着大湖西岸向北漫步，朝十里外的黄葛树走去。这条路，是长寿湖西岸向北直通垫江县的古道，这里的几棵黄葛树是古道上人们歇脚的地方，树下有几幢大瓦房，排列成既像街又不像街的幺店子。黄葛树坐落在又宽又长一头向下伸进湖水中的青石滩上。没修水库之前，这里很热闹，来往行人很多，不是歇脚就是吃点什么或是住上一夜。此时人们行船走水路了，这里就变得十分冷清，留下的几户农民还种着他们祖辈留下的田和地，只不过公社化后土地归公了，他们只是一个生产小组了。七月天，烈日下走了十来里，坐在树根缠绕的石围台阶上，观赏眼前山色湖光。看傻了，

看累了，看得想睡。我就用草帽做枕，双手遮眼呼呼睡起来，这几天思想太累了，太累了。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我睁开双眼，依稀可见在浓密的黄葛树枝叶中有一张久违了的面孔，他就是李正，剧院歌剧团大提琴手，一九五九年补划右派。自年初转到长寿湖，他和罗远凯、王恒分配到长寿湖东北方深处的生产队后，就一直没见过面。在二郎峡我俩曾同住一个村，在两河乡我们同吃一锅饭，来到长寿湖半年不见面，一见自然是有话说不完。

他问起铮铮，我只答两个字“吹了”，别的只字不提。最后他说王恒死了。这是我们艺术剧院十几个右派中短短两年死去的第二个。

李正说，王误吃了马桑泡中毒而亡。怎会呢？原来他们所在的生产队在大战红五月的双抢中，队长心血来潮，为了鼓励大家争干犁田的重活，每天增加一两口粮。王恒就为了这一两口粮把老命给送走了。王恒是什么人？抗战中热爱话剧，抱着一颗赤子之心，把继承的家产卖了拿来支持所在的抗敌剧社。他对戏剧的热爱超过了他的长像和演技，哪怕一直跑龙套演个小配角他也很高兴。解放后以老艺人身份进入四川人艺话剧团，一生孤单，直到四十多岁被毒死还是光棍一条。王恒体质单薄，从未干过农活，哪能犁田嘛！这种活儿就是一天增加一斤口粮也是入不敷出的。就在犁田中也饿得他要命，忽见满山红红的马桑泡，就摘下来一颗颗往肚里吞，当然就要了他的命。他没有亲人，只有一个远房妹子在歌剧团。不知是没有通知还是她不想来，生产队就在第二天用他那件黄色全牛皮长大衣裹住尸体，软埋在湖边消落地。不知农场干部是有意还是无心，这样不正好可以喂鱼、灭尸吗？第二年开春又是红五月，只见他的尸骨架子，不见他的腐肉和那件牛皮长大衣。又是一桩忘不了的悲剧。

李正告辞，说是去狮子滩场部医院看病，明日返生产队。他也是身有疾病的人。我一人继续在黄葛树下发怔，思前虑后，下定决心与铮铮一刀两断，什么缓兵之计，那是幻想，什么摘帽后还可入团入党的光明前途那更是扯蛋，那么还要不要给铮铮去信说明我已给学院党委去信了呢？不，绝不！我已感觉学院党委在对我给铮铮的去信进行监控，万一发现，他们看都不看一下，只凭信封就会说我们的一刀两断是欺骗组织，啪一下将铮铮打入酉阳秀山，那不一切都完了吗？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敏感时期。死心吧！死心吧！彻底完全地死心吧！

黄葛树下仍是那样清凉，夕阳西下，微风丝丝，告诉我该走了，该回去了，过了采石场的晚饭时间你就要饿一夜肚子了。面对西下的夕阳余光，我向采石场住地爬去，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片空白。

一九六零年七月，我彻底地中止了和王铮铮的一切联系。

一九六三年，我调到宜宾文工团，结识了舞蹈演员张淑君，进而恋爱并于一九六七年结婚。生了两个女儿。一九七一年在军分区政委徐怀旺逼迫下，与妻子张淑君离了婚，后来徐政委又逼着张淑君嫁给了他。这一段婚姻，我另外讲述。

人们说缘份是迷信，信则灵，不信当然就不灵，我就不信，却灵了，怪事儿。

一九七五年深秋时节，文工团派我去成都出差，任务就是将当时红极一时的由成都市和四川省两个歌舞团创作演出的三个革命单双舞蹈的舞美设计图抄绘回来，文工团要排练演出这三个舞蹈，由我担任舞美设计。自从我告别了话剧舞台之后就担任绘景工作，当专职的舞美设计师调离之后，就由我来顶替了这个角色，从此虽然只能算个业余却在各类身份证件上正二八经地填写“舞美设计”，直至退休。

那天上午我去省歌找到该舞的舞美设计高践渝。我们少年时期认识，他是重庆人，一九五四年初中毕业考入四川美院附中，我考入演训班，在一个校园常见面。他附中毕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学了舞美专业，毕业后分配省歌工作，我们一见如故，一边抄图一边回忆过去，谈得很投机。

图抄完了，时间到了正午十二点，我就问他王铮铮住在哪里。他一听，睁大眼睛反问：“你认识王铮铮？”我说我们是老乡、初中同校不同班，都热爱艺术，不仅认识还是好同学。当我们一块走出画室时，他就指着一幢宿舍楼对我说：“王铮铮就住在那幢灰楼的第三层，楼梯上完对着的那间。”一看这幢名符其实的灰砖楼，只有三层，我想从一九六〇年盛夏重庆火车站分手后十六年没见面，来都

来到了省歌，而且就在灰楼下，怎么说也应该上去看看她。而且早就听说她成绩不错，是三个川音声乐的高材生之一，两民歌一美声，她就是那个美声。近几年，我由于离婚后在宜宾就算是没有家的人，每年都有一次法定的探亲假，每年我都要回邻水去探望亲人，同时路过重庆都要上张淑君父亲家住上几天，看望两个亲生女儿。在邻水，王铮铮的母亲最爱上我大哥家摆龙门阵，由于与铮铮有那场初恋情，他们就更亲近，当然免不了都要摆谈女儿和弟弟的事情，所以我就知道了铮铮已经结婚生了个女儿。我多少有点好奇心，想看看她的家和孩子，当机立断上三楼看看。

房门关着，敲门无回应，轻轻一推叭嘎一声，只开了一指宽的缝儿不敢再推，又轻轻敲了两下门，还是无回应，难道屋里无人？我又不想出声叫王铮铮，想让她看看十六年后的李文书是否变成不认识的人。我又使劲敲门，还是无回应，确认屋内无人后我才大胆推开门，站在门外一看，屋子不大，只有几个平方米。一张床既不像双人床也不像单人床，一米多一点宽却占了屋子的一半，床上用品全是旧的，没有鲜艳的色彩、乱七八糟一大堆。这屋不像有人住，我想一定走错了门，急忙关上门下二楼问问。因为我上楼时见二楼过道上有人在做饭，是位女士，我就轻声请问她王铮铮住哪里？她正在炒菜，就用锅铲指了指斜对面开着门的一间屋说“住那里”。我过去一看仍然空无一人，只见屋里贴窗面对面放着两张单人床，中间摆一张条桌、一把木椅子。再看洗漱用具，两张面巾两个洗脸盆，还有两个竹制书架。这不像结了婚还有孩子的人住的房，我又问做饭人：“是这间吗？”她很肯定地说：“就是这间，上食堂吃饭去了。”要我进屋去等。

进屋后，我仍然疑惑不定，便四处寻找一点能证明是她住房的蛛丝马迹，终于找到一张《参考消息》，报纸上写有王铮铮三个字，虽不像她的笔迹，那定是收发室的送报人写的，这无疑就是她住的屋了。我便安下心来坐着等。过了五分钟没回，再过五分钟还是不见人，一直等到十二点过了多大一半，仍然没回。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不吃不行了，想必她根本没在团内，出了远门，我还傻等什么呢？便起身出了门。出了省歌大门，沿西大街往东，一见老牌的“刘鸡肉饭馆”，一下子口中出现了近二十年前的味道，不妨进去回味儿一下，点的就是牌子菜外加清汤、一杯酒三两饭。饿了，好吃，全下肚。一看时间：十三点过十分，起身往我住的东大街省工会招待所走。路程很远，我喜欢走走逛街，明天就要回宜宾，我要好好在成都街上玩一玩。边走边看边想，十六年不见的王铮铮没见着，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走到西大街与东城根街拐弯处红光电影院门前，犹豫着是直走还是向右拐，最后决定不直也不右，回头向后再进省歌。不见心不甘！

吃饱喝足，二晕二晕，回头又进了王铮铮家门，还是没人。我决心等，很不客气倒在床上歇着等，不知等了多长时间，忽闻一声很好听的女高音：“谁！”不是惊叫而是诧异。我起身盯住站在门框中的王铮铮。她没认出我，我一眼就看出是她，毕竟十六年啦！一个是从少女变成了妈，一个是人却变成了鬼。我有思想准备，当然能一眼就认出，她无一点思想准备，怎能一见如故？我故意不出声，考考她的记忆，要愣多长时间才能认出我来。她盯住我，站在门框中一动不动，足足五分钟。“哎呀！是你呀！！”没叫我的名，也没有激动不已的泪。这就够了，十六年后能认出我这个鬼很够了！

然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她正处在家庭分离的苦痛中。我没问，她却要说，见到多年不见的老乡老同学、长她几岁的同志哥加上那段初恋情，不说不行，情不自禁。就这样，她拉着我出了省歌大门，沿西大街到东城根街又向西穿过多子巷到长顺街，走完长顺街又到了西大街，又沿着老路转了三个大圈儿，将她十六年来心中的欢乐与苦水细细道完。此时天已黑尽，街灯初上，我们在红光影院前分手告别，她说希望我明天不要回宜宾，去望江公园，把她分居在父亲处的女儿叫出来玩上一天。我答应了。

第二天，她早早来到东大街省工会招待所，我刚刚吃过早饭，正在同来学舞的几个舞蹈演员交待我还要再待一天。然后我就同铮铮坐公交车去接她女儿。车过九眼桥到了终点站，这一带是成都东郊工厂区，烟囱林立，正冒出浓浓的白烟和黑烟。我们沿着厂房外围墙下的简易车道走了很久，忽见几

个孩子在沙石堆上玩沙投石作打仗游戏。铮铮呼叫一声，女儿从游戏中跑来，她拍去女儿身上的沙，擦净手上的泥，牵着出了厂区，来到河边坐木船渡河到了望江公园。我们穿过一片竹林进入茶园，喝茶的人不少，我们忙着张罗坐下，小家伙很乖，也忙着搬来竹椅子，手脚很利索、眼快手快。人们都说女儿像父、儿子像母，我看铮铮这个女儿脸蛋儿像她，铮铮也像父，一看她们就是王家人，不知长大后性格是不是一家。铮铮的女儿同我的小女儿是同年生、大月份，都是一九六八年。铮铮说她女儿在省歌是出了名的小美人儿，最喜欢跳舞，摹仿白毛女、娘子军，在省歌院坝一跳，照样是垫脚尖跳芭蕾，引来演员们注目围观，鼓掌叫好。我见小女孩搬竹椅的利索劲，相信铮铮夸她的女儿是真。女儿的归属成了她离婚的条件，僵持的焦点，已经三年。我们在望江公园玩了一天，把她女儿送回工厂，我们就在九眼桥分手。

有人一定要问，十六年后与初恋的情人邂逅，她又处在离异的僵持中，你又是单身汉，是不是都有再牵手的打算？实话实说都没有。她那天说的是十六年前分手时学校对她的政治压力，毕业后在省歌本是一帆风顺，却遇文化大革命阻止了事业上进，还造成了一场不幸的婚姻。我听了不是同情、只有深深的同感和叹息，这十六年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不幸，而是整个这一代人的灾难，生不逢时。早生十六年、晚生十六年，都能在人生的节骨眼儿上躲过这场浩劫，使青春阳光灿烂。我回到宜宾还是画我的画，一切照旧，我们都没有通信和往来，只是把这个邂逅看作缘份，仅此而已，有缘大家来相会！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我正在老家探亲。大哥对我讲，铮铮离婚了，年初还把女儿送回邻水，交她母亲照看并上了小学，王妈还经常带着外孙女来玩。大哥还说，王妈有意要铮铮与我组建家庭，铮铮也有这个意思，问我是否也有这个想法。我一时难以回答，毕竟婚姻家庭是大事，尤其像我们这种情况，都有一次失败，虽然失败的原因各异，我还是要多多考虑。首先考虑的还是政治身份，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毛泽东死了，右派能否翻过来？要翻不过来，我再也不能给家庭带来灾难，宁可永远打光棍。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感情挂帅，结果失败。再说，毛泽东虽死却阴魂不散，必须再等等看个究竟。

大哥就说可以给铮铮通通信，至少应该如同过去，是老乡、是同学、是好朋友嘛。是的，大哥的话很在理，当我回到宜宾后，给铮铮寄去了十六年后的第一封问候信。此后我们书信不断。铮铮是个右二代，书信中，我常给她谈宜宾几个右派朋友们对时局的议论。

一九七七年的春节，我由宜宾到成都的当天晚上就与铮铮住在一起，还是在灰楼，还是在那张一米多一点点既不是单人也不叫双人的床上结婚了，整整一夜，十六年前初恋的欢乐又重演，还是那样年轻，还是那样鲜活那样美。第二天我们请来证婚人：铮铮川音本科同班同学、省歌管弦乐队首席小提琴。大名鼎鼎的四川两个小提琴王，一个是在重庆的我的右派朋友杨宝智，一个就是这时在成都的唐佐天，人称唐儿子。感情深的同学和同事干脆称他两个字——“儿子”，就是这个“儿子”成了我们的证婚人，没请他吃饭，只拿出一颗奶油太妃糖，还是十八年前我们初恋第一封信中夹带的那个牌子的上海奶油太妃糖，去了糖纸由铮铮亲手送进“儿子”嘴里，说：“我们结婚了，你是我们的证婚人！”“儿子”笑了，用标准的成都话说：“哪儿啰，咋个这么简单，不行不行，咋个说也要把川音的同学请来聚一聚哇塞，不是吃颗糖，咋个说也要吃顿夫妻肺片噻！不行不行，这跟你们从恋爱到结婚一路坎坷、十多年失去音信又重逢，太不相称，应该热闹一下，由我来操办主持。”

我就说：“‘儿子’算了，谢谢你的好意，你说的都是个形式，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最起码的形式——扯个结婚证都免了。”

“儿子”听了有些惊讶：“这儿怕免不得哟！”

我说就是要免，什么婚姻法那是哄百姓，我在宜宾堂堂正正扯了结婚证的婚姻，应该有法律保护吧？然而给一个龟儿子当官儿的一句话就搅黄了。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家，并非家庭不和感情破裂，婚姻法结婚证管个屁用！我们就是不扯这个一文不值的结婚证，我们就是不要什么单位证明，只请你这个够

朋友很落教的好同学好朋友吃颗糖证个婚就算完事儿。

证婚人听了很高兴，嘴里还包着那块糖笑吟吟地说：“我就是教堂牧师，祝你们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相伴一生！”

一月后回到宜宾，分别请来了团内外好友，就在票房旮旯拐角胶囊居，对他们讲我同初恋情人结婚了。朋友们为我高兴。小右结婚又成了一条新闻，我想上级组织领导不会不知道。怎么不来开个证明办个证？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把婚结了？太不像话，目无组织！我就要看看他们当官儿的过问不过问，结果他们悄然无声，小右派无法无天，成了！（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黑皮书》。）■

老温---小温---老温

老 赵

和老温相识已经有七、八年了。彼此都是阳谋鬼计的罹难者，也就没有详细了解他的情况。

老右都是被冤者，各有各的被冤法，没想到老温真是冤中有冤。

说起来我应该叫他小温。1955年我已经在机关工作了四年，他才刚从北京育英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候他是班上“品学兼优奖”的获得者，青年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根据“组织上”的动员，他考取了国防性质的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了一年预科，就转入了本科飞机场建筑专业。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当时立志要为祖国的国防建设献身，正处在意气风发，前途无量的黄金岁月。

1957年，读二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共产党号召全民帮助党整风。校方反复传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策精神。在全校开展了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

小温当时是团支部书记，当然得义不容辞地带头参加。按照他作为一个远离社会环境，生活在学生圈子里，社会知识有限，刚刚进入成年，年轻学生的理解，解放以后经过了土地改革，哪还有地主？三反五反运动之后，私人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哪里还有资产阶级？这种认识本来合乎其年龄特征，但在班级学习会上，他发言说：“现在没阶级敌人了，还能用阶级分析吗？”就成了政治问题。

接着有同学说：“匈牙利为什么会发生群众游行的反革命事件呢？”小温说：“很可能是匈牙利党有使群众不满意的问题。”有人谈到青年人犯错误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是教育问题？还是改造的问题时，小温说：“当然是认识问题，当然是教育的问题啰。”

这位天真的青年学生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几句话竟然构成了“罪行”。在整风运动的后期，在班上挨了批判，还让他写出书面检查。团支部还给了他“团内警告处分”，（后来报到系里没有批复。）当他天真地暗自庆幸自己没被戴上右派帽子时，实际上“中右分子”的材料已经装入了他的档案，而且这材料要跟随他一辈子。

到了1958年的2月，哈军工党委召开大会，由副院长刘居英宣布：“经过反右运动，说明学员思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需要改造。学员需要分期分批轮流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暂时把肩章摘下来，锻炼一年，锻炼好以后，再回学院继续学习。这是首批，以后还有二批三批，首批最光荣。”此时此刻，小温当然就得积极响应号召，争取第一批下去。三月份，院方决定368名学员需要下放改造。其中206名完全相信刘院长说的：“锻炼好了，还回学院学习。”的许诺，戴着大红花被下放到黑龙江的北大荒“友谊农场”当农民。一夜之间，这批国防科技的大学生，变成了二级农业工人。

另外的162名同学当时就识破了院方的阴谋，选择了另一条路——“回自己老家”。年轻学生终究敌不过刘院长的老奸巨滑。哈军工当时是军队建制，回家时本该给他们办“转业证”，却谎称“地方工作需要”，成心给他们办了“复员证”，学院领导实际上就切断了他们回院学习的可能性。再说，他们这边回家，那边“组织上”早已通知了当地的“组织”。同时，在档案里又偷偷塞了黑材料，致使那些回原籍的同学长期找不到工作。极少数回到城市的，找到工作也是当工人。再者，

因为“来路不明”，有运动就挨整，不是右派的也是右派。有的已经读到四年级了，却一辈子在农村。有的人直到改革开放了，83年和老温取得联系时，还当农民。一个学有专长的大学生，竟让他当了几十年农民，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有这等事？害得这一百多名军工专业的大学生终身处境极为凄惨。

按照当初院方的说法，下放到北大荒的这206名学生，学习锻炼好，是要回学院继续学习的。谁知1959年3月，学院派学员科科长李宝元到农场召开大会，突然宣布“一律就地分配”。实际上就是不许回院，叫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几年的军工课程等于白学。

在哈军工两年半的学生生活中，小温当过防汛模范，立过三等功，学习成绩优异被通令嘉奖……如今，就因为几句话，竟然被骗到农场，骗成了农工。而且说不定永远被沦为半劳改的农工。多么可怕呀！一个率真的20岁出头的莘莘学子，他哪里懂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权政治？从此以后的多少年，每每夜深人静，想起这悲惨的结局，小温常常不由得暗自悲伤，潸然泪下，以泪洗面。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搞《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始，就十分重视利用“地痞、流氓”。而后再经过多次运动的培植，形成了各个单位都保留一些靠运动往上爬，靠运动发家的家伙。这帮人干工作不行，一搞运动，他们就来了神儿，编造栽赃、无限上纲、献媚上级，陷害同事，不管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运动结束，在“不许挫伤积极分子的积极性”的政策保护下，都不予追究。还落得个“升官发财”。因此，每次运动尽管都有宣布的政策，那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形式，实际上这帮人的话就是政策，他们会变着法儿整人，而且是越“左”越好，最后都会被“组织上”认可。好人遭殃，坏人猖狂。到1957年，毛泽东执政八年，在单位、学校就已经培植了一批这样的人，也造成了当时的人文风气。

按照处理“右派”的政策，“中右”只是“暗入档案，控制使用。”并不随同那六种处理右派的方法一同处理，还要分配工作，只不过分配的条件差。可是哈军工这帮痞子领导，为了讨好上级，给自己领功，捞取个人好处，竟然把这206个学生“升级处理”，用“大红花”把他们骗到农场，搞成终身半劳改的农工。另162人则罚回老家，逼回原籍，作最受歧视的工作，改造一辈子！这可真所谓“何其毒也”！

在农场来说，小温毕竟是有用的知识分子。劳动了一年多，1959年3月，农场分配他到二分场担任小学教师。7月份接着又调他到七分场三道岗中学担任中学教师。

没想到换了新工作还引出了一桩难得的婚姻来。小温讲起他的婚姻来说：

我去中学之前，中学的上级-----总场文教科的徐某给学校打了个电话说：“今天马上要给你们学校调去一个老师，他是从哈军工犯错误下放的学生”。

接电话的正巧是刚从当地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不久的王莲滨老师。王莲滨心想，犯错误，肯定不是好学生，说不定是个穿着港裤、尖皮鞋，梳着大背头，流里流气的年轻人。

等到下午，一辆马车拉来的是一柳条箱书，一卷行李和穿着黄上装、蓝裤子，貌似空军军官的英俊青年。学校的老师，包括王莲滨老师，就觉得奇怪，大学生不在学校读书，跑到农场干啥来了。都用一种奇异的目光好奇地看着这位哈军工的大学生。

两天后，孙校长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当然小温没资格参加），向大家宣布：“新来的温广彦在哈军工犯过错误，是中右分子，大家要和他划清界限，帮助他改造思想。”

（按政策，“中右”是只由人事单位内部掌握，不公开宣布的。而小温则公开“被宣布”。看来这位孙校长也是一个不管政策，只会狠毒害人的家伙。）

那位王莲滨老师为人直爽，对反右运动也不甚了解，第二天她一到办公室就直截了当地问小温：“你在哈军工犯过错误？”

小温也坦率地说：“是的，是犯过错误。”并且把经过详细告诉了王莲滨。王对于温的“错误”有她自己的看法，她非但没有歧视温，反而在较长时间的接触中，认为小温实际上是个好人，他讲的是实话，算不上是什么错误。而且不顾别人的冷言冷语和被剔出党的积极分子行列的政治压力，竟然从

同事又萌生了爱情。党团组织多次找她谈话，动员她和小温划清界限她都没有动摇。充分表现了她具有独立思考思想的坚决性。

她的家庭对她也很有支持，王的老母亲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别人谁也管不着！”老太太多么“给力”的话语！

小温感慨地说：“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她和她的家人都没有嫌弃我这个中右分子，1960年，我们终于在政治压力和饥荒的艰难岁月中结了婚。”

十年浩劫来了，小温一家被打成“反革命右倾翻案分子”。就因为土改时岳父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成份定为贫农。文革一来，造反派随意又给改成地主。还毫无根据地说他岳父是日本特务。他们不服，告到县政府，就说他们是翻案。红卫兵给他和年迈的岳父戴上40多斤重，两米高的铁帽子游街。还被批斗了上百次。最后关进牛棚一年多。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让他们回过一次家，那还是要他们回去陪造反派抄家，找翻案材料。回家一看，两个孩子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照看孩子的岳母由于年迈体弱，承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精神压力，生活极度不正常，面对此情此景，小温精神不免受到极大刺激。王莲滨老师回头看到五岁的二儿子，大冷天裤子膝盖磨破两个大洞，立刻心疼地抱起孩子，一边泪水盈眶，一边问孩子怎么会成了这样。孩子一边回头感伤地泪眼看看久未见到的妈妈，转身又用恐惧的目光看着那些凶神恶煞似的造反派，用一种似乎是成年人的语音发出一声“唉----”的叹息。这一声五岁孩子不寻常的叹息，像一把尖刀，刺在王老师的心理上，王老师简直痛不欲生。她刚毅地为了不让造反派看到流泪，放下孩子，匆匆走出小屋，强忍着眼泪，一直没回头，跑回了“牛棚”。

后来，夫妻俩从牛棚被放回来，两个孩子都已经患了肺门淋巴结核。听岳母说，他们蹲牛棚时，大儿子正上小学二年级，老师曾为他逃学找到家，当时岳母也不知道，直到他们回来问及，才知道因为父母都被造反派关进牛棚，还公开批斗游街，尽管孩子在学校品学兼优，却忍受不了从校方到同学的百般歧视。不但经常殴打、谩骂，学校一出现所谓“反标”，学校领导总要把他留下来审问。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身、心承受了大大超过了其年龄可承受的压力，孩子不得不隐瞒姥姥逃学，在山上远远地看到同学放学再回家。在十年文革期间，孩子从来不敢上街玩儿，只能兄、弟俩在院里玩。有时出去也从来都不敢说话。小温听了孩子稚气而沉痛的陈述，再加上这一年多人间炼狱的洗礼，对他刺激深重，感到这世界上的人简直是最可怕的动物。好久他都不愿意看到人。

1971年4月，落实政策，把小温夫妇从下面的分场，调到友谊农场总场教书。依然没有摆脱被歧视，该分给他们的房分给了别人，四口之家只让他们住在一间连厨房才九平米，常年不见阳光的阴暗小屋里。北大荒的冬季滴水成冰，屋子里却没有取暖设备，只能尽量靠烧炕取暖。室内的最高温度只不过偶尔达到13度。

小温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从他考取了哈军工，他给自己确定的理想目标就是专家、教授。然而面临的现实告诉他，理想已经破灭。他只得暗下决心，培养两个儿子实现他的夙愿。

当时，大儿子刚上初中，小儿子读小学。四口人真正的居住面积只有六---七平米。两米宽的“炕”上放一个小饭桌，四口人各占一角，小温夫妇备课，两个孩子看书写作业。谈论人生，讨论心得，研究功课，粗茶淡饭，都集中在这不足一平米的小桌天地间。当时正是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们夫妇却教育孩子，努力学习，好好作人，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知识，对社会有用的人。多少年如一日，一家人就在那九平米的天地间，生活着，学习着，奋斗着，在长期艰难困苦中辛勤地追寻着未来。

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没有一平米的小炕桌，竟成了小温夫妇和两个孩子，这艰难的一家，艰苦卓绝，齐心奋斗，一步步战胜邪恶，走向理想的伟大平台！

命运有时候也会眷顾好人。1978年赶上了高考。几年的辛苦换来了收获。大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外边一派萧索，家人和亲戚聚在家里，不具备物质条件，都不是诗人，此时高兴得却用作诗来庆贺。

孩子的老舅在贺诗里有这样的句子：“悲过思悲悲难已，喜中闻喜喜欲狂。”考取北大的大孩子也激动得填了一首词《水调歌头》：“溯今昔荣辱，忆十年兴衰，谁知昔日鬼辈，怎敢笑开怀。出没瞠目讥语，孤身招架风雪，余寒昨尚在，冬寒犹可恨，贼风更为害。乾坤转，太阳近，春天来。烙印深深，方解国士早成材。不怕千难万险，只恨口难开。唯有奋斗路，为国献博才！”（〔註〕此处的“口难开”是指孩子十年没有在外边说过话，一和人说话就“口吃”。）词填得虽显稚嫩，却也表达了孩子多年抑郁的心境。哥哥的收获给弟弟作了榜样。读初三的弟弟也感动得趴在炕上写下七律一首：“闻兄已经入北大，久旱逢雨乐狂然。小弟果然真无志？比兄更上一重山。廿寸小臂想揽月，三尺短腿要游天。请君等视余展翅，京城兴会更无前。”历史真让这个初三的有志孩子言中了。1981年，第二个孩子又考上了北大。

兄、弟双双考取北京大学的事，不但那友谊农场从来没有过，在北大荒三江平原也是绝无仅有，震撼人心的罕事。有了好事，自然也就来了党的关怀，友谊农场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小温此时已经50岁了，心情自然激动，喃喃自语道：“这倒象神话中‘劈山救母’的故事，两个儿子劈去了压在我们头上二十多年的大山。”

时光又过了十年。他应国防科技大学邀请，参加了哈军工建校三十年校庆；也代表几百名“下放学员”要求补发本科毕业证书。那时，他和原三系丁仁正到张文峰副校长家，谈起当年下放他们，说还回校学习，却不让他们回校的问题时，张文峰副校长当时竟说：“那是骗人，那是欺骗！”究竟谁欺骗？应该由谁负责？没有下文。这就应了研究极权主义的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说法：“有罪行”却“无罪人”的论点。这种问题在我们国家的确是一个开脱害人者，让受害者无可奈何的普遍现象。

然后他还应国家农垦总局、国防科技大领导的邀请，在他们机关里给“干部”作《怎样教育子女成材》的演讲。他在中学的科研成果也获得了黑龙江省的奖励。

1985年，他参加了民盟。担任了佳木斯市、双鸭山市人大代表，友谊县政协副主席。王莲滨老师成功地进行了作文分格教学实验和中学语文单元教学的改革实验，被评为特级教师。

1990年代初，刘居英院长千里迢迢到新疆看望当年被他下放的学员时说：“这件事干的缺德呀！”谁缺德？当年不是你干的吗？如今你没缺德谁缺德的？政治痞子就惯于演这种政治戏，他们惯于厚着脸皮把自己的责任一推六二五，永远装好人。这也折射出正直的中国人，经常面对的是一群什么玩艺儿。

1994年退休，夫妇在北京科利华教育软件公司工作八年，编写中学电脑家庭教师软件。

大儿子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二儿子1987年在北大读研时，搞出来零电阻91K的超导材料，获叶企孙实验物理一等奖。受到时任总理赵紫阳的接见。后赴美读博，定居美国工作。

小温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自然规律终于把他变成了古稀老者，成了老温。他们搬来北京居住。只可惜王莲滨老师积劳成疾，2004年癌症夺走了她65岁的生命。现在，老温在闲暇时，得以操练业余爱好---书法和篆刻，过着消闲的养老生活。

平静生活并没有使老温忘掉不公的苦难，他仍然和那批哈军工的同学在追索他们被迫害时造成的经济、精神方面的损失。

中国人喜欢用牌坊表彰杰出的人物和事件。清朝末年，义和拳败于八国联军，曾经屈辱地要给一个德国军官修建牌坊。但不久，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来就用那份材料，在北京中山公园新建了一个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汉白玉石牌坊，上书“公理战胜”四个大字（后来，历史文物都要作些改变，“公理战胜”改为文痞郭沫若写的“保卫和平”）。有时候看到老温，我怀着钦佩的心情，头脑里总好像有一个构图：老温一家站在中山公园，老温戴着他喜欢的那顶巴拿马卷边帽，一家人的背后，是那汉白玉牌坊，牌坊上的四个大字，似乎不断地转换着-----公理战胜-----战胜邪恶-----公理战胜----战胜邪恶.....

迟到半个世纪的忏悔

罗洪生

半个多世纪前，爸爸的遗书中有写给我的如下文字：“你这不孝之子，如果人真有魂，我在阴间定要把你抓去，问你个究竟……”

爸爸是位有理想与追求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夕，在重庆求精中学任教时常出入当时民盟总部——被誉为“民主之家”的特园。1948年春，他回到川北西充老家后，分得约6亩土地的祖业，当起了农民。不满10岁的我，也辍学跟着爸爸妈妈下地种田。

在农村均贫富的那场运动中，工作队内部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重庆“面粉大王”鲜伯良[注1]的妹夫，肯定有钱，应不应该拿钱出来作“胜利果实”？结果该拿出来的论点占了上风，于是，爸爸注定要被打倒挨斗了。

在爸爸挨斗的前几天，那位与我们同姓的积极分子——中尧伯，在山坡上找着正在打柴的我，逼我、打我，要我在几天以后工作队同志问话时，一定要按他教的那样说，反之，连我爸爸他都要打，更会把我打个半死！

两天后，中尧伯一行来到罗家大院里。一位叫李宁的工作队女同志亲热地将我的“童子军”衣服扣好，问我为什么没有读书？说今后要带我到重庆去读书。听了这话我感动极了，眼里涌起了泪花。紧接着她问：“小朋友，你家里有金砖？……”——这正是中尧伯教我必须承认的，正想否定时，中尧伯那凶神恶煞的眼光，逼得我只好点点头，接着我又慢慢地摇了摇头。随后，我便被带到村里与家人隔离。

就是我的点头承认家里有金砖，给父亲带来了杀身之祸。

在斗争爸爸的那天，中尧伯做贼心虚，担心我翻供，就叫我和弟弟去赶场卖猪交罚款。待我们把猪卖完回家里后，看见爸爸的双臂后剪，吊在阴暗后屋的横梁上，长伸着舌头，怒睁着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

隔壁的彭大妈，听到我们的哭声，忙过来帮助放下爸爸的尸体。这时我们发现他被细麻线捆扎着的两个大拇指，被吊得筋骨皮肉全无，鲜血淋漓，全身也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彭大妈确信参加斗争会的人已散尽，忙把我叫到她的里屋去，低声地讲叙了打死我爸爸的过程。

在毒打我爸爸时，有人主张吊“鸭儿浮水”：把爸爸的双臂向身后反背着，用纳鞋底的麻线，紧紧地套牢两根大拇指，再把篾绳对接在麻线上……在捆扎麻线时，爸爸知道厉害，痛苦哀求着，轻声地喊道：“周公哟——我相信你是好人呀，张澜[注2]哟——表方老哥，鲜英[注3]哟——我的二哥，你们救救我呀！”

在重庆时，爸爸向来把常来住于特园的周恩来称“周公”，张澜称表方老哥。爸爸的亲舅子鲜伯良，和特园的主人、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的鲜英是堂兄弟。但是，这帮打手只知道鲜英是国民党的师长，更不知道周公和张表方，便大吼道：“什么公呀婆呀舅子老表的，这年代还敢叫国民党的师长来救你？给我吊起狠狠的打！”……直到其中有个人说：人都死透了，还打个屁！他们看见我爸爸确实死了，立即跑出了后屋。彭大妈家与我家后屋同墙相隔，她从墙缝窥视了吊打我爸爸的全过程，眼睁睁看到我爸爸被吊打致死。等我们回来才敢过来帮助。他儿子还严肃地对我说：“你要对人家说，是他自己上吊死的。你听哥子的话没错。”

说来也怪，1959年罗中尧被饿死前，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地喊着“中枢，我对不起你，你不要抓我，……”喊了两天才断气。罗中枢是我爸爸的名字，中尧伯为爸爸的屈死心里应该是有愧的吧，他临死前作了忏悔。

爸爸走后没有几天，重病的妈妈也跟着去了，留下我们兄妹四人成了孤儿。那时我12岁，是家中的老大，村里的当权者说我是“家长”，又把爸爸的“帽子”给我戴上。要求我同那些“地主分子”一样，每三天或五天要向村武装队长作一次思想汇报，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赶场时秤盐打油，出村去走亲串戚，都要请假，不按时消假条要挨批斗、挨打骂。种田和除野草我不会，生产队长说我懒，痛打我好几场。有一次我被打伤了腿，贫农陈婆婆偷偷地送给我膏药，我幼小的满是伤痕的心，感受到些许的温暖。

1953年春，我舅父鲜伯良知道我们的处境，送我们到西充县城读书。读初中时，我填写入团志愿书，把填写文稿交给我在西充速成师范当校长的堂兄罗孔昭看，他要我在爸爸“自杀”字前添上“畏罪”二字，还要我违心地添一段狠批爸爸的话语。从此，在我那几十年填写数不清的履历表里，都写着爸爸是畏罪自杀，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装进了我的档案里。

五十多年以后，我已年近古稀，子孙满堂。可爸爸的死、和他得知我向工作组的同志说“家有金砖”后所写下的遗书，却让我心里时时内疚，每当想起父亲的死，我的心都会抽缩的痛。可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阅读了儿子写给他的这篇《迟到半个世纪的忏悔》，一定会原谅我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讲真话可能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幸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家提倡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主张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实质上是对曾经有过“不受约束地施加暴力和采取残暴行为”，造成莫须有的死亡的一种自责和纠正；也正是对人的生命权、对人权的尊重。

爸爸，您泉下安息吧！

[注1] 鲜伯良（1903—1990），抗战时期的重庆“面粉大王”，四川西充县人。1934年创办重庆复兴面粉公司，独创“麦穗”牌面粉享誉各地，在重庆面粉业独占鳌头，大有“三分天下复兴有二”之优势。1935年创办江海银行重庆分行任经理。1942年以法币600万元资本创办重庆复华银行，同年又在南充建面粉厂。他还担任重庆永中保险公司董事长、重庆红十字会副会长。1956年重庆复兴面粉厂实行公私合营后，任经理。曾任重庆市一至八届市政协委员，重庆市工商联执行委员。

[注2] 张澜（1872—1955）民盟创始人之一。字表方。四川南充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职。

[注3] 鲜英（1885—1968）陪都重庆“民主之家”特园的主人。民盟创始人之一。字特生。爱国民主人士。四川西充县人。1931年在重庆嘉陵江畔建特园。抗战时期，常年居特园对来重庆的社会各界人士热情招待。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郭沫若、沈均儒、冯玉祥等人常来活动，张澜等常来下榻于此。1941年民主同盟在特园成立，他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重庆民盟支部负责人。他任《新蜀报》负责人，经常报道被国民党封锁的消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三次去特园见他和张澜。毛还手书“光明在前”四字赠其女。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积极策反川军将领工作。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1957年被打成“右派”。

（本文人名、地名和内容完全真实，绝无虚构。本文是应今年《南方周末》征文“说吧，我的内疚！”而写。可文章投去，如石沉大海，过了好几个月，也不见有其它“内疚”的文章发表。估计，此次“征文”夭折。）

大跃进年代大学校园里的吃饭轶事

陶渭熊

本文所记为大跃进时期大学校园的“饮食文化”，全系笔者亲历亲闻。

吃饭方式的“优胜劣汰”

笔者 1956 年进入西南师范学院读书，吃公费伙食，质量之好叫人羡慕：一日三餐敞开肚皮吃饭，早上稀饭馒头油炸花生米，中午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餐三菜一汤一荤两素；每周还有一次会餐，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和当时农民半年糠菜半年红薯的生活比较起来，简直是九天九地的差别。

可是好景不长，1957 年秋天以后，伙食就越来越差了，虽然还能敞开吃饭，但肉食已经比较难见，菜蔬也明显减少。1958 年春节过后，任人吃饱的甑子饭已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罐罐饭”——在一个小瓦罐子内放三两大米，加水蒸熟后每人一罐，也就是说只能吃自己的“定量”，不能敞开肚皮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必须接受社会主义的计划管制。

但罐罐饭没有实行多久，又被“盆子饭”取代。

所谓盆子饭，是在一个直径尺许的搪瓷盆内放八个人的定量（2 斤 4 两）加水蒸熟，每桌一盆，由同桌的八人分食。此举简单易行，操作方便，竟在吃饭方式的“自然选择”中“适者生存”，从 5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粮食定量取消为止，历时 20 余年。

不过盆子饭在 1958 年 9 月又取消了一些时候。因为大跃进高唱“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如果连“天之骄子”的大学生都还定量吃不饱，那就太说不过去了，所以打肿脸充胖子又吃了几天甑子饭。但 59 年以后，任人吃饱的甑子饭就再也不能起死回生了。

分饭、分菜百态

一盆饭端到桌上，由每桌 8 人轮流值日分饭。值日的任务是领饭、分饭、洗饭盆、把饭盆交回厨房、保管饭票和“饭刀”。

饭票由伙食团制作加盖公章后每桌一张，领饭时上交，还饭盆时取回。一旦丢失，一桌人吃饭无着。

饭刀是一把长尺许，宽寸许的竹片，削成餐刀状，自制而成。

值日将盆饭领回后首先看饭面平不平，如果饭盆在蒸锅内没有放平，则蒸出来的饭就会一面高一面低，分饭人就得削高填低，填平压实。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找准直径。如果直径没有找准，那么分出来的饭就会一边大一边小，就分不均匀。找准直径的方法，是分饭人用筷子在盆饭的中线上比画，找出中点，再将饭盆旋转 90 度，在另一条中线上找到中点，如果两条线的中点重合，则证明找准了圆心，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第三步是过圆心作直线，用饭刀将一盆饭一分为二，然后又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每一等分就叫一“牙”。为保证每一牙饭的大小均等，用筷子作直尺，饭刀垂直向下，不偏左也不偏右。

饭分好后就按一定的规则每人就各取一牙。规则有多种：一种是向右或向左依次取饭，第一人有权选择权；一种是按一定的顺序自由选择，当然人人都选大留小，分饭人吃大家选剩的那一牙；还有一种方法是分饭人将饭分好后，闭着眼睛把饭盆在桌面上旋转若干转，各自取食对着的那一牙，以示随机分配避免偏心。

分饭和取饭都在同桌的严密监督下起进行，所有人的眼睛都跟着饭刀的移动而移动，生怕分饭人的刀法不好，更怕他的心术不正。如果饭刀没有划直或没有垂直向下，分出来的饭大小不均匀，其他人就会立刻指正；待到取饭时，则注视着相邻人的动作，生怕自己那一牙被邻人“挖墙脚”，上面看来还比较大下面却是个“小脚女人”……所有人都高度紧张神经过敏。虽然大家都贵为天之骄子，但

“挖墙脚”的事还是时有发生。

除分饭外还要分菜，也轮流值日，但与分饭错开。每桌一钵牛皮菜或青菜之类的平常菜，分配不难，难的是一年一遇的五一、国庆、元旦节加餐，就必须额外认真仔细。那就要先把菜中的肉一片一片地挑出来，再根据肉片的肥瘦、厚薄、大小搭配好分到每人碗里，力求分配均等减少误差，然后再分粘附了油荤的蔬菜。其实所谓加餐，分到每人碗里也不过二两肉而已，但却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当然又是一场紧张的互相监督

“玻璃汤”：惟一可以敞开供应的食物

说大跃进年代什么东西都定量供应，那也不是事实，大救星还是给大学生们准备了一种可以任意取食，让人“吃够喝足”的东西，那就是：“玻璃汤”——其实就是盐开水！

玻璃汤的制作简单，在一个大木桶内放几勺盐，将一挑沸水倒入桶内用木棒搅动，无色透明的玻璃汤就制成了。一个食堂只要放置几大桶玻璃汤，还怕你“敞开肚皮”吃？

虽然大家都知道玻璃汤不产生能量也没有营养，都知道自己既不缺水也不缺盐，水和盐吃多了会使自己已经水肿的脚杆更加水肿，但是进食堂的第一步还是先舀一碗玻璃汤边走边喝；再把那一牙饭、一箸菜掺和在里面匆匆地吞下，使那长期饿扁了的胃产生一种鼓胀的快感，也算是万般无奈中的最佳选择了。

如果遇到五一、国庆、元旦节加餐，兴许那无色透明的玻璃汤会变成乳白色的肉汤，那就如久旱逢甘露了，必有许多健将于下课后以世界冠军的速度冲向食堂，先舀那汤表面漂浮的油珠珠，再打捞桶底有没有带肉筋筋的骨头。一旦有所斩获，自然大喜过望。我曾见过某位早有准备的“健将”在下课后的第一时间，以100米跑的速度冲向肉汤，眼看就要夺得金牌，却忙中出错，跑到了食堂门口才想起忘了带碗……当他不得不回去拿了碗再到食堂时，肉汤已被抢完。功败垂成，“金牌”失之交臂！

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生为一口肉汤竟如此亡命，确是世界级的“景观”。

罐罐饭：竟成一场运动的重要内容

罐罐饭有许多缺点，例如罐子易破碎；工作量太大；在一大堆如山的罐子堆里也不容易寻找自己那一罐；最让人头痛的是一些同学趁大家拥挤在罐子堆里的时候，拿了别人那一罐，迅速处理之后又若无其事地拿写着自己名字的那一罐，以致那被拿的人无饭可食。这种事在各个食堂都有发生，还有燎原之势。西师党委认为这不是一般的生活小事和品德问题，而是对统购统销、粮食政策、三面红旗的政治态度问题。于是就在1958年5、6月开展的“反坏运动”中成为整治的重点内容。

我不知道这个反坏运动是西师的创造发明还是全国高校的统一部署，也不知道反坏运动是不是因偷罐罐饭而引起。因为此时我已到农村“脱胎换骨”，但是听留校的57难友说，各系都整得很凶。凡是有偷罐罐饭行为的，都被揪出来批判、斗争、检讨、认罪，态度恶劣的还被定为“坏分子”进行专政。例如中文系60级的陶x，就是这次运动中被定为坏分子的“运动员”。因为他和我都曾先后分配到大巴山下教书，他对我说过此事。

大学生偷饭，又是世界级的大笑话！真是大跃进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

肿病药：人人争吃

正常情况下没有人想吃药，但是大跃进年代却是人人争吃肿病药的。

大跃进的社会标识之一，就是肿病患者遍布全国，全国一片肿。你看那路上的行人，皮黄肌瘦，腿脚粗肿，脚杆上一按一个窝，久久不能复原；步履艰难，每迈一步都直喘粗气；面色腊黄犹如死人，两个眼角向外倾斜，两只口角向下垂吊，那就是水肿病人。大学生也不例外，至少80%的人都患肿病。患肿病的人可到卫生科开处方领一包肿病药。因为患肿病的人实在太多，所以领肿病药要站很长的轮子，往往放弃上课站一上午或下午。肿病药不是天天都有，常常进一批，很快“销售”一空，要等上

好几天才有第二批。所以一旦打听到卫生科运进了肿病药，就像食堂里出售不要粮票的馒头，人人争抢。若行动迟缓没有拿到医生的诊断处方，没有抢到肿病药的，则深感遗憾甚至口出怨言。那些少数没有患肿病的同学，看见别人大包大包地拿着肿病药，也投去羡慕的目光。

为什么大家对肿病药都趋之若鹜？答案很简单：因为它能够充饥！

肿病药的主要成分是炒熟的麦麸和细米糠，加上少量饴糖，再配以女贞子、车前子、山药、茯苓等中药制成，吃起来不但有香味、甜味和并不难闻的中药味，更可以填充饥饿的肠胃。想想看，那些正处于生长发育高峰期的 20 岁左右的大学生，每顿只吃被克扣后的三两米饭（其实不足二两五钱），加一箸没有油荤的青菜；或者每餐三两包谷粑，三两豌豆，甚至于六两麦麸，营养和能量都入不敷出，饥饿难忍的人来说，一包肿病药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所以肿病病人大多把它当成一种既治病又不定量的免费食物。

每一剂肿病药为 500 克，有一大包，规定服用三天。但是浮肿待毙的饥民，谁按定量服用？一天不到就吃完了；有的用开水调和后一“顿”吃完，摸着肚子说：“几年没有吃饱过了。”

真话与假话

大跃进即是大饥荒，全民饥饿，无一幸免。但有人说“我就吃不完”。

话说西南师范学院某系某年级某班有个学生江某，因为觉得腹中空空全身乏力，而劳动又多，总是行动迟缓萎靡不振。那个时候对劳动的态度往往是政治上的标尺。班长和团支书就找他谈话，批评他缺乏干劲有思想问题。江某直率地回答：“饭都吃不饱，哪里有干劲！”

这话很反动！那个时候，谁说“吃不饱”，谁就是反对三面红旗和粮食政策，谁就是“反党”。江某的话就是对党的不满和攻击。班长和团支书觉得事情重大，于是跑步向系党总支汇报。党总支决定开班会“帮助”江某。

事情发生在大跃进惨败已成定局的 1960 年，大家的政治热情早已退烧，又都十分饥饿，知道江某所言本是事实，就没有谁真心“帮助”，班会开得冷冷清清。正要结束时，没想到积极分子 xx 钧站起来厉声斥责江某“攻击诬蔑三面红旗，思想非常反动”，他说：“谁说吃不饱？党供应给我们的粮食就是吃得饱，我顿顿够吃！如果再给我添一点的话，我根本吃不完。”

他的话使大家目瞪口呆。在大救星统治下，虽然大家都把说谎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嘴巴上成为一种生存的本领，但是如此露骨的说谎还是非常刺耳。江某更是忍无可忍，呼的一声站起来指着 xx 钧的鼻子说：“‘再添点饭你吃不完’是你讲的真话？”xx 钧拍着胸口说：“是呀，我就是吃不完！”江某说声“好！你记住。”就气冲冲走了……

几天后 xx 钧去农场劳动，不能按时回来进餐，叫人把晚饭给他带回寝室。江某主动给 xx 钧留饭。他咬紧牙巴忍受着饥饿，把自己那一份饭菜和 xx 钧那一分合到一起端回寝室。xx 钧劳动回来饥肠辘辘，看见偌大一碗饭菜，喜出望外！风卷残云吃个精光……

等他吃完后，江某走过来问他：“吃了吗？”“吃了。”“饱了吗？”“饱了。”“舒服吗？”“很舒服。”“你不是说你吃不完吗？那是两个人的饭啊，你把我的那一份都吃了！”

“……”xx 钧一时大窘，无地自容，知道这一耳光是自己打在自己脸上的。

事情汇报到系党总支。党总支认为江某的行为不是一般思想问题，而是蓄意报复打击陷害积极分子，性质非常恶劣。于是江某再次被“帮助”……

好在当时不在运动之中，江某没有被戴帽子，但批判检讨认罪是免不了的，而且记入了档案。毕业后江某被分到穷困山区，从此默默无闻；而 xx 钧因一贯积极，对党忠心，毕业后留校、读研，后来当教授。

正是：说真话变蛇钻草，说假话成龙升天。

回忆大跃进年代大学校园里的吃饭轶事，使人尴尬使人难过，使人羞愧也使人心酸。大学生本是

社会的未来和希望，本应有高尚的情操和文明的风尚；于吃于穿，于行于止，都应该潇洒自如落落大方体面光彩。但是他们在吃的问题上，却表现得如此贱相、饿相，如此猥琐、下着，为了一口饭，一箸菜，一勺汤而斤斤计较你争我抢斯文扫地！他们何至于如此不要脸面不计身份不成体统？

古人云：“仓廩实则行礼节，衣食足则行荣辱”。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原是一种反自然反社会的疯狂，一种不计百姓死活、趋民如猪狗的罪孽！其结果必然是哀鸿悲鸣，尸横遍野，4000多万饿殍填塞沟壑！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虽然幸免于饿死，但那每天可怜的几两粮食加一箸无油无荤的青菜，实在难以维持长身体长智慧的基本消耗，使他们在肿病与饿殍之间苦命挣扎；仓廩既不实，衣食也不足，也就管不得什么礼节荣辱了。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忆当时的吃饭轶事，我们对大跃进该作怎样的反思呢？

2011.4.10. ■

唉！窝囊也能死人

老 赵

中央编译局老干部处李处长在电话中告诉我：

“老徐于2010年11月15日去世了。我们给举行了个简单的仪式，参加的人只有他的应该是叫‘前妻’的女同志，还有那个女儿，那个男孩子也去了。我看见还有你送的一个花圈。”

我回答说：“自从在二炮医院看过他以后，再去就找不到他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要不告诉我，我哪能知道他去世？那花圈想必是他家谁搞的。最后是在哪个医院？你们几时找到他的？”

李说：“协和医院，人都死了，她（指徐的女儿）能不找我们？”

在旁边的老伴问：“谁去世了？”

我说：“老徐，老徐去世了。”

“唉，老徐真可怜呀！”老伴叹息地说。

这是我今年春节前，和中央编译局老干处李处长的一次通话。

老徐，徐鸣珂，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审，安徽泗县人，85岁，中共党员。

1957年，在当时称作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作俄译、副科长时，中了“阳谋”之计，没“鸣”没“放”，被“找补”成右派，而且还是极右。

1958年被送“半步桥”，又一同到茶淀农场，又在同一个队，又编在一个组，在一个房间住了大约两年。

刚到农场，他担任了一个时期我们的组长。不久，我就发现他胆特别小，有时候我们在劳动中，刚缓一口气，停下来，他看见队长过来，就慌里慌张的悄声说：“哎，哎，来了，来了，快动起来，快，快。”其实我是尽了力的，打心里对强迫劳动不满意，他这一说，更引起我的反感，我就是不动，要缓这口气。等到队长过来，也没说什么就走过去了。这时候同组的张志华总会笑着说：“老徐的胆被吓破了。”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劳动、生活整天在一起。彼此处境相同，自然地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难友情谊。有时候我们不免对“划右”、“劳教”、“政策”……发些议论，老徐只是在旁边听，不敢多说话。

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看家信，他告诉我，在编译局和一个从武汉大学分配来的女同事已经恋爱，并且商量好要在1958年的“五·一节”结婚。结果当然是“棒打鸳鸯”，1958年的2月就把他送到“半步桥”，接着把那位女同事调往武汉。他没有亲戚，孤单地只有他自己一人。谈起这件事，他难过得泪水盈眶。

1959年夏，农场给假三天，让他回北京，处理留在原单位的衣物。结果他只去了一天就回来了，

我问起他来，他说：“唉！没法说，已经被开除了，单位谁管你？那些衣服、书籍全发霉了。准备结婚作的一身毛料衣服全完了。连皮箱都发了霉。把你划成右派，同事没人敢跟你说话。我住在一个小旅馆，那服务员看了我的住宿证明信都另眼相看，你说我哪有心思再住下去！？”

1959年秋，我们从茶淀三分场调往“生死场”——于家岭分场。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一组。“大饥荒”的时候，我在厕所碰到他，他正摔倒在地，爬不起来，当他听到我喊他时，他勉强仰起脸，那是一张只剩下一层干瘪老皮，消瘦得难以辨认的脸。慢慢爬起来，连掸掉衣服上浮土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赵，我们……怕是回……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呀！”

那时候我也成了病号，两腿浮肿，行动滞慢，勉强想拉他一把，却没有一点力气，我只好宽宽他的心：“但愿我们都能回去。”

1961年，我第一批被摘掉“右派”帽子。初冬时候被送回北京养病。当然我不敢和农场任何难友联系。他们的情况和下落我一概不知。

1978年，给右派改正的政策下来了。我那时已经于72年又转成“铁饭碗”的正式工人——木工。上班的单位在西长安街，窗外就是长安街的人行道。斜对面是电报大楼，那是一段外地人来京经常游玩的街区。有一天没事，我正在单位大门外站着，忽然看见老徐从西边走过来，他同时也看到我，黝黑而消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紧走了几步，一边伸过手来，一边高兴得说：“啊呀！碰到你了！碰到你了！”

他往左右看看说：“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

我说：“这就是我工作的单位，走，进去。”

他迟疑了一下，怯怯地说：“能行吗？方便吗？”

我和他开玩笑说：“高级单间，还不行吗？”

实际上我虽然是木工，经常在行政科和基建办公室，我把他领到单位后院我好久没进去的木工房。两间房，空无一人。坐下来，他嗫嚅着说：“我…我…还没吃中饭。真不好意思说，我兜里只剩四毛钱。”

那时候我和单位的工人相处得都非常好。虽然早已开过饭了，我立刻到食堂找师傅给我打了一份饭菜。端回来让他一边吃，一边聊他的情况。

“……我后来体力不行，安排我到葡萄园劳动。文化大革命来了，大概要抓好多人，要送到农场，把右派大都送回了原籍。我老家一个亲人也没有，没有投奔的地方。那也得送回去。到泗县（安徽）农村，谁给你房子？把我安置在一间小庙里。原来根本没人住。屋顶的一角露着天，下雨，下雪都能飘进屋。什么也没有，谁给你家具？我睡觉的床就是几捆稻草……”

当地很穷，我劳动一年只有30几元的收入。

这次落实改正政策，光火车票就花了一半存钱，我来了20多天，单位不接受我，我没钱了，我想明天到单位要一份车票钱，不接受我，我也得再回去呀！唉！真没办法……”

听了他凄苦的倾诉，我十分同情这位老实而可怜的难友。我问他：“你住在哪儿？你能不能解决住的问题？”

“我住在头发胡同一位老乡家，再住十天半月大概还可以。”他说。

我对他说：“你要能解决住的问题。吃饭的事我来帮你。你每天来我这里吃午饭。吃午饭时我也给你买一份晚饭。带回去晚上吃。单位不接受你不符合政策，你得继续找，找以前的头儿。你要自己回去，那你就得继续当农民，说不定你还得住你的小庙……”

聊到快下班，我给他买了一份晚饭把他送走。

编译局的负责人根本不知道老徐当年的情况，原来的局长姜椿芳已经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我建议他去找老领导。后来他多次找了姜，姜作为老领导给编译局作了工作。前后拖了十几天，编译局终于决定接受老徐回原单位工作了。对于老徐来说，总算有了活路。

1984年，我被借调深圳工作。这一去就是七年。没和老徐联系。

1991年，我回来，过起了退休生活，才见到老徐。那时候他已经结婚。妻子是再婚，带过来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婚后给他生了一个女孩。他总想有自己的孩子，这愿望也满足了。

我们住得不算远，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偶尔也去他家看看。他来免不了说些难对他人启齿的话题。他说：

“我领着我小女孩出来，有的老太太逗孩子：‘跟你爷爷上街哪！’你说这话叫我听了，这叫什么事儿？唉！这一辈子。”

“他们吃饭吃得好，我有时回来晚，给我留的就是面条，有一点菠菜。”

“你怎么那么窝囊，你那儿出胡同就有饭馆，自己买点好的吃。”我说。

他说：“不行，在外边吃了，回家不吃，她要和我闹，吵，怎么办？”

他简直窝囊到家了，什么都怕，好多事都闷在心里。

……

真叫做时光荏苒，大概是2004年，他来了，嗫嗫嚅嚅地说：“你说那男孩都工作了（那个五岁带过来的小男孩，不觉已经体育大学毕业，当了教师，也结了婚。）现在要买车，也得我拿，你说，这这这……这家里一切开销都是我，她（徐妻）的工资全存起来，一文也不出。她娘家的药费、电话费……全是我呀。”

“那是你儿子，你不拿谁拿？”我忽然想起来：“哎，他的生父呢？超过18岁，你的义务就尽到了。他那生父也不能一点也不管吧？”

老徐说：“他不能管？”

“哎？为什么？”我有点纳闷。

“人家离婚就因为这孩子不是人家的。”

我一听，这问题还复杂了。“那么是谁的呢？”我问他。

“唉，唉，不能说，没法说。反正这孩子不是他的……”

“噢，原来是这样，那是没法说。”我总算明白了。既然明白了，我就得表态，我笑着说：“这倒好，人家是只管云来雨去，不管经济负担。你收养了人家，那就得你掏钱，你不拿钱谁拿？”

……

2008年，老徐住的宿舍要拆迁，拆迁单位要给老徐120多万元让他买房搬家。没想到由此竟引出了大事。

老徐的妻子和带过来的男孩子商量：“我们买一套13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选好的，地区好的。”压根儿不搭理这房子的产权人——老徐。

老徐闷闷不乐，来到我家发牢骚：“这家里好象没有我这个人……”

我还一个劲儿地劝他：“你老了，跑腿的事让他们去办好了。等‘定板’时你再出面。”

不料，一个月后情况大变。老徐带着他的女儿来了。他们说矛盾进一步激化了。老徐妻子和男孩商量说：“给她十几万，叫她嫁人得了。”那男孩说：“给她五万就不少。房子没她的事。”显然要“处理”这女孩。

那男孩有新买的房。老徐妻子已经搬出了，搬到哪儿不知道。拆迁办说：“腾了房子就给钱”。但人家只给“户主”、“产权人”——老徐。她们搬出拿不到钱，老徐父女还“坚守阵地”，没搬家。这一来，矛盾就更大。

发展到这一步，外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女孩看清母亲和哥哥合起来要处理她。也就铁了心，坚决要跟父亲（老徐）一起过。

这就基本上摆出了不惜离婚的架势。

一周过后，他们离婚了。拆迁费老徐60多万；其妻60多万。

拿了钱就得腾房。老徐和女儿在石驸马大街租了一套房，住了下来。我也去看过他两次。他说女

儿已经在编译局附近买了一套二居室单元，正在装修。既然买好了房，正装修。女儿也刚有了一份在博物馆上班的工作。暴风雨过后，情况好转，剩下的就是装修好搬回去，过安稳日子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我再去看他，那里说他搬走了，搬到哪里不知道。

既然新房在编译局附近，我就去编译局老干处去打听。结果老干处的李处长说，他们也找不到老徐了。把附近的物业公司访查遍了，根本就没有徐鸣珂和他女儿名字的产权人。后来他们觉得不正常，找到派出所报“走失”，派出所说单位没权报，必须是家属才可以报。这就是说，不但我找不到他，他的单位也找不到他了。那位李处长无奈地说：“老赵，咱们保持联系，不管谁找到，通个消息。”

差不多过了三个月，他女儿来电话了，说老徐已经住进人民医院。有了下落就好，我和老伴立刻去看了他。他躺在病床上，瘦了许多。我问他：“为什么搬走不告诉人？”他说：“一言难尽，钱都在女儿手中。不让我见人，见你，见单位的人。”

我问他：“现在你到底住在什么街？几楼？几号？”

“不知道，她着人把我抬进抬出，我也不知道。她们几个年轻人在房间商量事，也不让我听。电话也停了，她们都用手机……”他说。

这叫什么事！？这是一个亲生女儿，外人能说什么？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他。他说：“我不能回家，回去就得死。你想办法让我一直住在医院。我有时想吃蛋糕，没有钱。”我给了那个“护工”200元，这是唯一能依靠的人。可靠不可靠，我只能给他说了些客气话，请他在老徐需要时，下楼帮他买一点零星食品。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看老徐时，他不在了。一位好心的护士告诉我，可能去了“二炮医院”。后来我找到二炮医院，总算找到了他。他已经是“皮包骨”了，哽咽着说：

“你给茜茜（他女儿）作作工作，她太不孝顺了。你赶快帮我想想办法，我不能回去，回去就得死。”

我赶忙去找值班大夫，大夫说：“他现在是体能衰弱，没有症状。在医院主要是‘治疗’，他没有‘症状’，就不存在‘治疗’，应该是疗养的问题。你是他什么人？你们尽快商量一下，最好送他到疗养院。”

换了医院，护工也换了，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她说：“每天我和病人，两个人的三顿饭，他女儿只给10块钱，说实话病人能有什么营养？”

我回家给他女儿打电话。手机关机。家在哪儿？不知道。

两天后，我再去看二炮医院，护士说：“徐鸣珂出院了。”再问到了哪里。护士说：“不知道。”我又找不到老徐了。

春节前，接到编译局老李的电话，才知道老徐去世了。

他怕回家，他怕死，但他还是死了。

他窝囊死了。唉！窝囊也能死人啊！

要是1958年“五·一”他和已经要结婚的人结了婚呢？

如果没有那几十年非人岁月的洗礼，他会这样病态地窝囊吗？

他不甘心被“断子绝孙”。总想要自己的孩子。

他没有想到：那和自己共同育有一女的妻子，似乎根本就没有和他“白头偕老”，共度此生的打算。

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辛勤后半生，爱护有加的爱女竟这样回报他。

他最最不明白的，也是他死不瞑目的，恐怕是中国传统的“孝道”怎么会变成这样？■